

國共內戰時期蘇南地區佛教發展狀況 ——以經懺佛事為中心（1945-1949）

劉 瓊

摘 要

1945年8月15日，苦熬八年的中國人終於等到了日本的投降。關於日本投降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中國佛教史，亦即國共內戰時期的佛教狀況，現有的研究成果很少。內戰時期絕大多數寺廟和普通僧尼如何生存，他們賴以為生的經懺佛事受到怎樣的影響，仍然有許多探索的空間。

戰後兩年，對倖存的感恩、對亡者的思念和對未來的恐慌，導致蘇南人民的宗教熱情空前高漲，進香拜懺等宗教信仰活動迎來了高潮。然而，歡慶的餘波尚未停歇，國共雙方在東北、華北一帶再起戰爭。大量僧尼逃難江南。1949年4月共產黨發起渡江戰役之前，兩黨的戰場一直在長江以北，蘇南各地並未直接受到戰火的衝擊。但是，戰爭仍然從多個層面影響到蘇南僧尼的生活。國共雙方在情報、工運等各領域的暗鬥，使蘇南僧尼生活和經懺佛事受到消極影響。不過僧尼也不是完全被裹挾在歷史大潮中而毫無能動性。國共兩黨利用寺廟和僧尼作掩護工具，僧尼也利用兩黨的鬥爭爭取自己的利益。在物質利益、政治認知和宗教信仰糾纏混雜的時期，平衡物質收入和宗教修行變得無比艱難。

關鍵詞：蘇南、國共內戰、佛教、寺廟、經懺佛事

Buddhism During the Civil War: The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in Southern Jiangsu, 1945-1949

Qiong Liu *

Abstract

Few studies exist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Mainland China between the surrender of Japan in 1945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How Chinese temples and ordinary monks and nuns survived during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s, and how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which most monks and nuns depended on for a living, were affected by the conflicts are questions worthy exploring.

In the initial two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grateful for their own survival, mourning the dead and fearful for the future, people in southern Jiangsu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religious fervor. Religious activities such as pilgrimage, worship, and request for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rapidly increased. Before this popular enthusiasm receded, however,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sumed their fighting in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monks and nuns flooded to Jiangnan for shelter. Prior to the Communist forces crossing the Yangtze River in April 1949, the battlefiel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remained in north of the River and most parts of southern Jiangsu were not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war. Nevertheless, the conflict still affected the lives of monks and nuns in the area in many ways.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and labor movement, for example, had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life of monks and nuns in southern Jiangsu. Meanwhile, monks and nuns were not completely passive in the current of events and lost all initiatives. As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s used Buddhist temples as their covers, the monks and nuns

* Ph.D. candidate,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ere also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attles to benefit themselves. Balancing religious beliefs and considerations of income beca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t a time when material interests, political attitude, and religious practice were closely intertwined.

Keywords: Southern Jiangsu, Civil War, Buddhism, Buddhist Temples, Buddhist Ritual Service

國共內戰時期蘇南地區佛教發展狀況 ——以經懺佛事為中心（1945-1949）*

劉 瓊**

壹、前言

1945年8月15日，苦熬八年的中國人，終於等到了日本的投降。對於抗日戰爭結束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中國佛教史，亦即國共內戰時期的佛教狀況，現有的研究成果不多。黃慧茹和學愚關注戰後釋太虛等人整理中國佛教會的情況，¹ 侯坤宏對國共內戰時期軍政機關、學校大量占住寺廟做過細緻研究，² 他另有專文介紹內戰時期逃港僧尼群體的生活。³ 這些研究豐富了讀者對國共內戰時期大陸佛教和僧尼命運的知識。但是，對於內戰時期寺廟和普通僧尼如何生

* 本文修訂過程中，得到華東師範大學韓鋼教授的悉心指導，又承蒙兩位外審專家多次提供資料指引和寶貴的修改意見，筆者受益良多，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4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3月2日。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¹ 黃慧茹，〈戰後中國佛教的復員與整理（1945-1947）〉，《中正歷史學刊》，第10期（2007年12月），頁173-200；學愚，《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44-381。

² 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頁272-298；侯坤宏，《浩劫與重生：1949年以來的大陸佛教》（臺北：妙心出版社，2012年），頁27-32。

³ 侯坤宏，〈避風港：1949年前後的香港佛教〉，《人間佛教研究》，第7期（2016年），頁97-157。

存，他們賴以為生的經懺佛事受到怎樣的影響？面對時代巨變，寺廟和僧尼又怎樣應對？內戰促使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為了謀生，僧尼又如何平衡經懺的物質收入和宗教修行之間的關係？這些話題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對戰後倖存的感恩，對亡者的思念和未來的恐慌，激發蘇南民眾空前的宗教熱情。1945到1946年，蘇南地區進香拜懺等宗教信仰活動十分活躍。⁴ 歡慶抗戰勝利的餘波尚未停歇，國共雙方先後在東北、中原、華東、晉冀魯豫、東北、海南島等地再起戰爭。大量僧尼逃難江南。偏安蘇南的民眾雖未直接受到軍事衝突的侵蝕，國共雙方在情報、工運等多個領域展開的暗鬥深深地影響著寺僧的生活和經懺佛事市場。但是，僧尼也不是完全被動裹挾在歷史大潮中，毫無能動性。國共兩黨利用寺廟和僧尼作掩護，僧尼也利用兩黨的鬥爭爭取自己的利益。

國共內戰時期普通經懺僧人的政治參與讓我們看到釋太虛等高層僧人之外的佛教徒與政治的關係。李濤以抗戰後期四川佛教漢藏教理院的兵役案為契入點，

⁴ 本文屬於地域佛教史研究，在具體介紹佛教歷史之前，理應對所選區域做出基本界定，以明讀者。但是這樣的界定並不容易。著名漢學家韓起瀾（Emily Honig）研究上海的蘇北工人時，曾被一個地域概念深深困擾。她發現，似乎並不存在關於「蘇北」或者「蘇北人」的明確概念。「蘇北」並不是一個地圖上有案可查，所有人都能達成共識的地理概念，它更多「代表一種關於某一特定地區同質同類的信念」。這樣的問題同樣困擾著筆者。如何界定蘇南？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學界對於江蘇的地理劃分存在較大分歧。一般人大致以長江為界，劃江蘇為江南、江北兩大區域。清代江南設江蘇布政司，下轄蘇州、常州、鎮江、松江四府、太倉一州、海門一廳。學界較多參考1935年地理學者李長傳的劃分：根據地質、經濟生產方式和民俗特徵等因素，將江蘇省分成西南丘陵區（多山區，含清屬江寧府、鎮江一縣）、江南平原（長江以南，茅山山脈、寧鎮山脈與西南丘陵之間的平原地帶，包括清屬常州、蘇州、太倉、松江、鎮江府除揚中、鎮江等縣）、江北平原（長江以北，淮河以南）以及淮北平原（淮河以北）四大部分。本文大體採用李長傳劃分的江南平原的設定範圍，但加上南京和上海。南京作為民國的首都，從政治角度看，是民國時期種種宗教政策重要的實驗基地，具有政治上的典型性；從經濟角度看，南京與上海、蘇州等江南平原地區一樣，擁有高度繁榮的城市工商業經濟，提供佛教儀式經濟生存的土壤。近代以來，作為中國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往來貿易極為繁榮。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此地大小寺廟眾多，佛事高度商業化，是考察近代經懺佛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域。綜上，本文所涉的蘇南地區特指江蘇省長江以南的部分，包括蘇州、無錫、常州、南京、上海等地。參見韓起瀾著，盧明華譯，《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李長傳編，《分省地誌——江蘇》（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1-14。

分析了釋太虛如何巧用「邊疆政治」與國民黨政府博弈，從而維護僧團的利益。他的研究令人頗受啟發。⁵ 但是本文研究的普通經懺僧人，可能沒有釋太虛那麼多的政治資源和光復佛教的偉大抱負，對他們來說，如何在戰爭的惡劣環境下生存下去是首要問題。

在物質利益、政治認知和宗教修行糾纏混雜的時期，如何平衡信仰和經濟成為蘇南佛教徒迴避不了重要問題。這也是佛教界和學界持續討論的話題。對此，法鼓山聖嚴法師和聖凱先生等曾著專文提出相應建議，總體上兩者都認為民國時期大多數僧人汲汲營營的經懺佛事和佛法本質背道而馳，是佛教衰落的重要原因和象徵之一。⁶ 美國佛學研究專家霍姆斯·唯慈（Holmes Welch，以下簡稱唯慈）的觀點更為寬容，他認為：

在分析佛事的財政效益的同時，往往也暗藏著忽略其本質的危險——就像我們將醫療行為當作醫生的收入來討論時一樣。從一位中國佛教徒的觀點來看，佛事即使很敷衍、草率，即使是由生意頭腦的和尚主持，對於正在受苦的更低界生靈仍有所助益，就像重視金錢甚於醫疾的醫生還是祛除病疾。雖然佛事涉及金錢交易，但基本上它還是出於慈悲、同情之心。⁷

然而，當世俗的黨派、私人糾紛、不平衡的經濟分配等種種現實因素日益侵擾到僧團內部，這樣的僧團和佛事還能有多少「慈悲」和「同情」之心？佛事還能一如既往地給生者以慰藉、亡者以超度嗎？

本文利用南京、常州、蘇州、臺灣國史館和蘇南幾大寺院所藏檔案、僧人回憶錄和期刊報紙等資料，力圖呈現國共內戰時期蘇南僧尼的遭遇和經懺佛事受到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思考佛教僧團應該如何平衡「形而下」的物質追求和「形

⁵ 李濤，〈僧侶從軍？——抗戰後期漢藏教理院兵役案的爭議（1943-1944）〉，《國史館館刊》，第74期（2022年12月），頁91-122。

⁶ 釋聖嚴，〈論經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收入法鼓全集編輯小組，《法鼓全集》，第五輯第5冊律制生活（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20年），頁194-215；聖凱，《中國佛教懺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365-386。

⁷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頁280-281。

而上」的宗教修行之間的關係。

貳、民初到抗戰時期蘇南佛事概況（1912-1945）

民國時期中國的寺院和僧人，除了有固定寺產的寺廟外，絕大部分依靠經懺佛事為生。揚州高旻寺住持釋來果曾言，有恆產的叢林道場，不應酬經懺佛事的寺院也不多。⁸ 對此，上海的叢林寺院並不諱言。⁹ 城市裡沒有廟產的小廟，更依靠佛事收入。有僧人甚至說，上海「百分之百的寺廟，都是靠應赴經懺佛事來維持的。」¹⁰ 蘇州西園寺僧人安上統計，民國時期蘇州有寺廟200多座，全部對外做經懺佛事。民國時期，經懺佛事收入是大多數寺院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經懺佛事對民國寺僧的重要性，可以從「革新派」僧人代表釋太虛身上窺見。1921年，釋太虛接管杭州淨慈寺，此事常被視為他革新佛教的重要實踐。¹¹ 然而，這次理想的實驗從一開始就沒有擺脫「懺焰」的支持。¹² 釋太虛從淨慈寺原方丈釋鴻定手中接管的不僅僅是這所寺院，還有他欠下的15,000多元的債務。接管淨慈寺後，釋太虛迅速裝修招待齋主、香客、來賓的房屋，良好的環境增加了佛事收入。春夏間該寺的香火經懺已經直追靈隱寺。一場大型水陸法會之後，淨慈寺的債務償還了十分三、四。¹³ 經懺佛事的收入是釋太虛能夠改革淨慈寺最

⁸ 高旻來果，《來果禪師廣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30。

⁹ 〈上海市各寺院聯合公告〉，《申報》，上海，1940年10月10日，版6。

¹⁰ 〈出家人也來個呼聲〉，《申報》，上海，1947年5月29日，版7。

¹¹ 江燦騰，《太虛大師前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頁156-162；陳永革，《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民國浙江佛教研究1912-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頁223-228；黃昆威，〈太虛大師與杭州淨慈寺〉，收入杭州文史研究會編，《杭州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頁286-297；鄧子美、陳衛華，《太虛大師新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17年），頁98-103。

¹² 即經懺和焰口。1915年，太虛曾作〈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論〉一文。在該文中，他將佛教沒落之表現分為四種：清高流、坐香流、講經流以及懺焰流。參見太虛大師全書編委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31卷雜藏·文叢（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頁40-41。

¹³ 太虛大師全書編委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31卷雜藏·文叢（一），頁230。

重要的經濟基礎。1926年冬，國民革命軍與北洋軍隊的激戰綿延至江浙一帶。政權更迭前後，釋太虛應上海居士玉慧觀之請，打算順應時機，在上海開展新僧運動。以往學者多關注這次運動革新的一面，如模擬基督教增加了「嬰兒湯餅儀」、「兒童入學儀」、「男女結婚儀」三項法事服務，¹⁴ 鮮少討論釋太虛對傳統的依賴和維護。事實上，這次革新的嘗試，他並沒有摒棄經懺佛事。他在自傳中說得很清楚，「適應上海商市情況，先立一經濟基礎，以作新僧運動，乃根據昔年的整理僧制論，辦一法苑，從改良各種佛教法事，以應時俗所需。」後來法苑也正是因為佛事興盛為同行所嫉才關閉的。¹⁵ 可見，釋太虛對經懺佛事的態度並非簡單得批判和取締。細緻考察釋太虛從民國初年到晚年對經懺問題的種種思考，程恭讓認為釋太虛並不完全否定經懺。反之，他對經懺佛事抱持一種相當理性的態度，即接受其長期以來的客觀存在，加以改良，使其能夠發揮正面和積極的意義。¹⁶

釋太虛的例子足見經懺佛事收入重要的經濟地位。然而，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受時局影響，蘇南大多數寺院佛事呈衰落態勢，賴佛事收為生的僧尼面臨不小的生存困境。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13日，淞滬會戰開打，上海華界由北至南陸續為日軍占領。許多市民不得不離開數代安居的房屋，湧向租界，艱難謀生。據統計，淞滬會戰爆發數周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人口從150萬激增到400萬。僅有10平方英里的租界人口已經超負荷，每戶平均達到31人。¹⁷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僧尼難逃戰爭的影響。上海租界相對安定的環境，在戰

¹⁴ 邵佳德，〈近代中國佛教制度革新的一個嘗試：以民國時期佛化婚禮為例〉，《佛學研究》，第2期（2018年），頁23-36。

¹⁵ 太虛大師全書編委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31卷雜藏·文叢（一），頁278-279。

¹⁶ 程恭讓、程琨，〈太虛對「經懺法事」的批評的再討論〉，收入李四龍主編，《樓宇烈先生八秩頌壽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518-530。

¹⁷ Finch Percy, *Shanghai and Beyo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pp.263-275. 轉引自魏裴德著，芮傳明譯，《上海歹土——戰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 1937-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

爭的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華界寺廟被毀後，租界成為許多僧尼逃難的首選。面對蜂擁而來的難民同胞，租界內的佛教徒並沒有袖手旁觀。黃慶瀾、聞蘭亭等佛教名流，聯合法藏寺、清涼寺、玉佛寺、海潮寺四大叢林道場，籌設後方醫院及收容所，¹⁸ 不少貧苦無依的僧尼避難其間。¹⁹

有錢的僧尼選擇更多，他們往往賃屋而居。因租界房屋供不應求，房價高昂，這些新到的富貴僧尼也無法購置高屋大廟，新增的寺院多似「佛店」。²⁰ 戰爭向內地推進，蘇州、常州、無錫、南京甚至五臺山等地僧尼逃難租界，租界內的佛店和居無定所的「馬路和尚」日益增多。²¹

禪宗名寺常州天寧寺的寺僧和經懺同樣受到戰爭不小的打擊。1937年11月29日，日軍由東南兩門入城，常州淪陷，交通斷絕。天寧寺因戰爭傷筋動骨。唯慈曾言：「在我所知的寺院中，受內亂、外侵影響最劇的，是擁有最多但失去的最多的常州天寧寺。」²² 此言不虛。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天寧寺至少有良田8,000畝。²³ 據該寺方丈回憶，1937年前，寺裡每年的收入在6萬到7萬銀元之間。這筆收入主要由五部分構成：地租2萬元，放貸金錢所得利息2萬元，放貸稻穀所得利息5,000元，買賣稻

¹⁸ 〈聞蘭亭等〉《大公報》，上海，1937年8月7日，版7；〈清涼收容所難民絕食慰勞〉，《申報》，上海，1937年11月4日，版6。

¹⁹ 《靈巖山萬年簿》（1926-1949），靈巖山寺檔案館藏（一卷本，無檔案號）。

²⁰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通誌》第十四卷「民族、宗教」，收入「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shtong.gov.cn（2023/1/15點閱）。

²¹ 「馬路和尚」：沒有固定住所的經懺僧。

²²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324。

²³ 天寧寺占有土地數量各方說法不一。美國學者唯慈1960年代採訪南渡香港的天寧寺僧人，得知該寺土地為8,000畝；1959年天寧寺歷史編寫提綱中記為8,600-8,700畝；《常州市宗教志》記為8,000多畝，潘義鑒主編的《常州市土地志》則為9,600畝。本文採取唯慈記錄的最小值。參見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324；「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1959年2月12日），〈天寧寺佃農抗租鬥爭（22-53）〉，《中共常州市委黨史委員會》，常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8-1959-2-2-50；《常州市土地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州市土地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09；常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常州市宗教志》（自印本，1991年），頁15。

穀1萬元，佛事1萬元，共計6.5萬元。1931年後，天寧寺不再買地，也不再用金錢放貸，將經濟中心轉移到稻穀交易上。²⁴

但是，依賴稻穀收入讓天寧寺在戰爭中遭到更大的打擊。天寧寺的8,000畝土地散佈在武進西南的湟裡、漕橋、運村和江陰南申港一帶，²⁵沒有一塊接近寺院。承平時，稻穀由內陸水道運來，寺裡有四艘收租船，出寺門就是河道碼頭，可輕易將穀物卸船。戰爭爆發後，水陸交通或是斷絕，或為戰火干擾，很難平安獲得租穀。天寧寺田產雖多，但是每年能收到的租穀卻少得可憐。該寺經濟一落千丈。²⁶

作為另一項重要收入來源的佛事也受到不小打擊。一方面，天寧寺地方大，房屋多，被日本人看中，成為日軍在常州的駐紮點之一。戰爭剛爆發，老百姓對日軍既恐懼又憤恨，避之唯恐不及。²⁷另一方面，多數居民朝不保夕，再無閒錢花在超度逝者的佛事上。即便有閒錢，也未必能穿過層層阻隔，抵達寺院辦理各項佛事手續。淪陷區的民眾，倘若出行，必須要去日本人設置的專門機關領取通行證或「良民證」，辦證的手續頗為繁瑣。申請人需要繳納一定的金錢和照片兩張，鋪保一張，經過日本憲兵隊的盤問，填明職業目的等專案，才可以獲得「良民證」。如果沒有通行證或者「良民證」，就有被當作游擊隊的危險。輕者被暴打，重者被殺害。各地民眾如非萬不得已，絕不輕易外出。²⁸

通行上的障礙和經濟上的困窘形如兩座大山，迫使寺裡不得不諸事從權，改變以往恪守的蓋不出寺做佛事的鐵律，到齋主家中趕經懺。²⁹抗戰最初的動盪過去後，天寧寺的情況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好轉。為了進一步開拓財源，1941年，

²⁴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329-330。

²⁵ 馮辰年、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意如法師講述：「天寧寺概要」（1924-1949）〉，（1986年3月17日），天寧寺檔案館藏。

²⁶ 道生，〈常州參訪專號：參觀天寧佛學院後〉，《中流月刊》，第3卷第5期（1944年），頁13-14；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331。

²⁷ 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天寧寺鄰居九婆婆口述〉（1986年3月15日），天寧寺檔案館藏。

²⁸ 〈家鄉消息：武進〉，《江蘇鄉訊》，第3期（1938年），頁1。

²⁹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331-333。

退居方丈釋證蓮到上海設立下院莊嚴寺。此後數年，莊嚴寺的接濟成為常州天寧寺祖庭最重要的經濟來源。³⁰

常州、鎮江相繼淪陷後，距離不遠的南京，很快成為日軍炮火猛攻的焦點。南京居民紛紛束裝就道，攜少數行李，逃出南京。³¹ 南京城內外大小寺院裡的住持僧尼、在南京掛單的外地僧侶，早在淪陷前就逃往各地。大多數客僧逃向上海租界，少數前往內地，南京本地僧人多數到南京國際安全區或難民營尋求庇護。³² 郊區名勝棲霞寺成為重要的難民營之一。住持寂然法師和廣大僧眾打開寺院糧倉，救濟25,000多名流離失所的難民。³³ 躲在難民營的1,000多位僧尼，每天領粥充饑，就這樣勉強維持了幾個月。³⁴

難民營並不是永久的庇護所。1938年6月前，南京各地的難民營陸續關閉。³⁵ 難民營關閉後，境遇最慘的就是沒有固定廟產，日常生活完全依靠經懺佛事的小廟僧尼。他們大多躲在難民營，庇護所解散後，這些僧尼別無去處，首選

³⁰ 〈證蓮法師〉，收入「Baidu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證蓮法師/12616605>（2023/1/15點閱）；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通志》第十四卷「民族、宗教」，收入「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shtong.gov.cn（2023/1/15點閱）。

³¹ 英文大美晚報，《中日戰事史蹟》（上海：英文大美晚報，1938年），頁213。

³² 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南京及蘇州に於ける仏教の實情調査》，收入大東仁、槻木瑞生主編，《日本の軍・學校・宗教關係資料》第4期「日本佛教（含基督教）の宣撫工作と大陸—日本語學校」（東京：龍溪書舍，2012年），頁50。與蘇南其他淪陷區不同，南京除了有如寺院、紅卍字會、上海居士林等團體創辦的難民營外，還有國際安全委員會成立的「中立區」。南京淪陷後，20多位外國人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日軍進城後，委員會緊急設立了八個中立區。中日雙方軍隊不可進入，南京市民可進去尋求庇護。卜正民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51。

³³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頁944。

³⁴ 「關於南京市內外事變後廟宇被焚破壞僧尼，無法返回庵寺，生活無著，要求救濟等情，致社會處報與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批復 附僧尼人數清冊」（1938年7月2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1002-2-1036-1。（本文應用之南京市檔案館、蘇州市檔案館及常州市檔案館等，係作者提供關鍵詞，由館員代為檢索，再直接開放該件閱覽，無法獲知該件所屬卷名及全宗名，故錄件名、日期、典藏地及檔號，俾於查索。）

³⁵ Mark S. Eykholt,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8), pp.101-102.

當然是回到原來的寺廟。但是南京城廂內外的寺廟，經過戰爭受損不小，或被焚毀，或被偷竊，許多僧尼已經無家可歸。即便有廟可住的僧尼，也很難再依靠佛事為生。民眾收入銳減，生活水準下降，居民幾無閒錢去做佛事。佛事需求大為減少。³⁶

1940年1月，日本軍方興亞院華中聯絡部調查員藤本智董接到指示，對南京和蘇州兩地寺廟展開為期20天的調查。藤本智董和中文翻譯僧人仁性，在南京一座小廟接引庵調查半日。他們與庵內女住持對談，留下了口述的原始記錄：

問：現在的寺院有多少人？

答：20個

問：佛事呢？

答：幾乎沒有。事變前，每個月10天左右外出做佛事。³⁷

接引庵的故事並非個例。1940年，日本興亞院南京佛教調查團成員所遇僧尼，無一不抱怨「香火清淡，僧人苦惱」。翻譯仁性說，接引庵的情況還比較好，這個寺院有廟產，是南京最富有的尼庵，年收入有一萬塊錢左右。³⁸ 仁性說的可能是戰前的情況。事實上，接引庵未必能穩定地獲得租穀。南京城內雖已被日軍控制，情況陷入壓抑的穩定，但城外農村地區，游擊隊、土匪勢力較大，常有租穀悉數被奪者。³⁹

棲霞山寺的情況與接引庵類似。1937年以前，南京市郊名勝棲霞山寺，每年有1萬多元的收入來自於信徒捐贈和各種佛事，另有8,800多元從田租等地產中獲得。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後，遊客減少，信徒捐贈大減，每年可獲利3,000元的水陸法會（三場）停辦。唯一慶幸的是，棲霞山絕大部分土地都在寺廟附近，沒

³⁶ 日本商業通信社編，《中國工商名鑑》（東京：日本商業通信社，1941（昭和16）年），頁590；Lewis Smythe,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Urban and Rural Surveys* (June 1st 1938), pp. 9-10, 轉引自 Mark S. Eykholt,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 pp. 79-80.

³⁷ 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南京及蘇州に於ける仏教の実情調査》，頁84-85。

³⁸ 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南京及蘇州に於ける仏教の実情調査》，頁84。

³⁹ 「准予發給證明書購辦平價食米以維生命呈日華佛教聯盟及社會局證明書」（1940年1月29），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1002-2-1300。

有一塊受到游擊隊的騷擾。來自土地的收入幾乎沒有減少，僧眾得以度過危機。⁴⁰

南京城內，像接引庵和棲霞寺這種有實產的寺院非常少，絕大多數僧尼依靠經懺為生。1940年後，物價騰飛，佛事大減，許多僧尼無錢買糧。即便以前有儲蓄的寺院，也不一定能夠買到大米。

蘇州大多數寺院和僧尼的情況與南京相似。戰時留存的百座中小型寺廟，有產業者極少。1931年，國民黨對蘇州城區221所寺廟調查顯示，蘇城擁有20畝以上田地的寺院共23所，其中17所寺廟的土地是公產。⁴¹其餘十之七八的寺院，都要靠佛事收入。那些普通僧人，日子更苦。作者玄嬰描述說：「營業僧人，為人家做佛事，往往日以繼夜，生意忙時，連睡眠也不夠。所得工資，連吃白飯也發生問題。」戰前香火旺盛時，他們的生活不成問題，倘若遇到淡月，就會有難以為繼的風險，需要靠典當為生。戰時米珠薪桂，佛事價格不斷上漲。⁴²許多寺院掛起止單牌，不再收留雲水僧和無固定寺院的經懺僧。許多以經懺為業的客僧脫下僧袍，另謀生路。有的賣燒餅，有的拉黃包車，有的當兵，有的回原籍蘇北。⁴³留在寺院裏的僧尼，大多數人的日子苦不堪言。

叁、抗戰結束初期佛事的復興（1945-1946）

1945年夏秋，抗戰勝利。隨著抗戰的結束，僧人釋真華和釋聖嚴的生活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出家10年後，釋真華終於可以離開河南，南下江南，到江蘇的叢林道場學習。

釋真華在律宗名山句容寶華山苦熬五十多天，快要完成比丘戒時，他終於聽到考佛學院的消息，還聽說太虛大師要來南京，在毗盧寺辦佛學院，授課法師都

⁴⁰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322-324。

⁴¹ 寺裡可使用土地，但產權非寺裡所有。蘇州已廢著名寺院雲嚴寺、開元寺等都是此類。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宗教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128-1129、1134。

⁴² 〈蘇城佛店〉，《清鄉新報》，蘇州，1942年10月21日，版2。

⁴³ 張夢鵬，〈閒話佛店〉，《蘇報》，蘇州，1946年10月1日，版3。

請好了。釋真華萬分激動，興匆匆地和其他八個戒兄一起到毗盧寺「趕考」。後來證明，毗盧寺佛學院只是「夢幻泡影」，他並未學到佛理，倒是親眼見證和感受到戰後南京毗盧寺興盛的經懺生活。

1945年冬，釋真華來到首都名寺毗盧寺。第二天早晨，寺中知客、維那和其他幾位執事僧來看望九個新到的僧人。他本來非常感動，沒想到大寺院的職事僧這麼體貼，還特意來關心他們的生活。哪知，維那師進屋後，劈頭就問：「你們會不會經懺？」7個會的僧人受到稱讚，他和另一個不會的也沒被趕走，只是讓他們慢慢跟著學。那7位青年僧本來只是幫忙的配角，奈何佛事太多，他們的生活異常忙碌：「客堂裡每天掛出的佛事牌上都有他們的大名，今天張府念經，李府拜懺，趙府放焰口；明天劉府放焰口，孫府念經，馬府拜懺；總之，念經、拜懺、放焰口等佛事，無日無之。」⁴⁴

釋真華在毗盧寺待了一陣，抗戰後第一個元宵節到來，首都萬眾狂歡，毗盧寺的佛事，也隨著佳節的到來，「一天比一天興隆了！」但他的佛學院夢卻徹底成了泡影。1946年新年剛過，貧病纏身的他，回到了師兄的好友主持的東嶽廟。東嶽廟是典型的小廟。既供東嶽大帝、東嶽娘娘等民間神，又供佛像。廟中共有14位僧人，一個伙夫，兩個挑經箱的香伙。⁴⁵ 釋真華到後，共有19個人。平日這些僧人外出趕經懺，他在寺裡做書記，記錄寺裡的經濟往來。這種悠閒的筆墨生活在1946年農曆7月15日徹底結束，他只得開始他百般不情願的經懺生活。按照慣例，農曆7月是大小寺廟最忙的時候，1946年又是戰後第一年，首都的佛事極其興旺，據他形容：

一進七月，東嶽廟的訂佛事牌上，寫得密密麻麻的，滿得不能再滿，念經拜懺放焰口，每天平均至少四堂。十四個客師忙得固然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當家師也忙得跟走馬燈兒似的，坐著黃包車轉進轉出的不停，燒飯的老趙，為了到外邊去找人幫忙，飯也沒空燒了。⁴⁶

農曆7月，大多數寺廟的僧人都忙於經懺，東嶽廟根本請不到外人來幫忙。

⁴⁴ 釋真華，《參學瑣談》（臺北：東方文化藝術研究所，1997年），頁47-49。

⁴⁵ 此處的香伙指廟寺中掌理燒香、點燈等雜務的人。

⁴⁶ 釋真華，《參學瑣談》，頁59。

當家師抱怨，按照南京的規矩，請外面的客僧，要付雙單子（襯錢），此時一個人給兩個半單子都請不到。當家師再也不能「放任」他。1946年農曆7月，釋真華正式成為一名經懺僧。他和東嶽廟的僧人們在南京大街小巷穿行，送殯，放焰口。⁴⁷一直到1947年初，他經人介紹，終於圓夢，到天寧寺佛學院學習。⁴⁸

透過釋真華的回憶，可以從個體經歷了解抗戰勝利初期南京大寺（毗盧寺）和小廟（東嶽廟）繁盛的經懺佛事。戰後毗盧寺和東嶽廟經懺佛事的復甦，除了受到民間需求增加的總趨勢的影響外，還和兩個寺院自身的因素有關。

毗盧寺作為南京三大代表性寺院之一，聲名遠揚。抗日戰爭期間，毗盧寺幾乎沒有受到破壞。⁴⁹戰後佛事復興，毗盧寺成為許多民眾訂購經懺的首選。東嶽廟雖是個小廟，但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廟裡當家師習初和雞鳴寺住持守慧有金蘭之交。雞鳴寺作為南京名勝之一，是南京市民閒暇時的好去處。每年農曆6月19日，該寺都有盛大的「觀音香汛」，來往香客摩肩接踵。⁵⁰因此種種，寺裡佛事鼎盛不衰。雞鳴寺一旦有需要眾多僧人參與的大型法會，或者佛事太多，本寺僧人忙不過來時，總會優先請東嶽廟的僧人們前來幫忙。東嶽廟背靠雞鳴寺這棵大樹，在經懺市場中處於優勢地位。⁵¹

上海的經懺市場也迎來戰後的復甦。釋真華背井離鄉半年後，釋聖嚴也從江北南通出發，前往大上海。可以從他的回憶中了解他離開南通的原因及上海當時的佛事情況。

促使他離開的原因，最直接的是南通緊張的社會氛圍和他所在小廟的經濟狀況。日本投降後，和平之光尚未完全覆蓋南通，國共相爭的暗殺之風卻呼嘯而來。釋聖嚴描述當時狼山的氣氛：

⁴⁷ 釋真華，《參學瑣談》，頁59-67。

⁴⁸ 釋真華，《參學瑣談》，頁89-91。

⁴⁹ 駿，〈社會名人訪問記〉（十六）「釋氏果言」，《南京新報》，南京，1941年6月22日，版6；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南京及蘇州に於ける仏教の実情調査〉，頁22。

⁵⁰ 濮德珪，〈觀音誕辰南京雞鳴寺 香汛最高潮〉，《申報》，上海，1948年7月27日，版5。

⁵¹ 釋真華，《參學瑣談》，頁77-77。

昨天還見他上山來，今天早晨早已躺在十字路口的血泊中，今天見他是有說有笑的人，明天已經被「紮」了「粽子」，沉在河溝裡；上午還見了面的人，晚上就被「栽」了「倒蔥」……狼山四周的人，凡是有些名望的或者好出風頭的，現在，天天有人躺下去，也天天有人失蹤了。⁵²

生活在暗殺恐怖下的百姓，即便有錢也不敢冒風險上山，狼山上的7座小廟，香火澈底斷絕，境遇甚至比抗戰時期更糟。未幾，大批國民黨中央軍開進狼山，與共產黨爭奪地盤。對於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新四軍，國軍幾乎束手無策。他們的到來，不僅沒有讓狼山的環境更穩定、更安全，反而給山上的寺廟帶來諸多破壞。拆除廟門作床鋪，將桌椅板凳當柴火已是家常便飯，倘若僧人據理力爭，一頓拳打腳踢是少不了的。狼山的僧人再難維持，紛紛離開，尋找其他出路。聖嚴隨著小廟裡的師兄弟，一起來到滬西的下院「狼山大聖寺」。⁵³

1944年，初建的大聖寺名氣太小，只承包了一個殯儀館的經懺權。1946年春，釋聖嚴第二次來滬，大聖寺的佛事已經漸漸有了名堂，又兜攬了3家殯儀館的佛事。隨著上海市面日益繁榮，到齋主家中做佛事的機會也日漸增多。寺裡僧人大有應接不暇之勢。⁵⁴

內戰開始後，像釋聖嚴這樣從蘇北跑到蘇南的僧尼還有很多。有僧人在佛教報紙《中流月刊》上大聲疾呼「救救我們」，明言「江北的小廟，給解放軍解放了。唉！我們也成了勝利的流浪者了」。⁵⁵僧人希望就是其中之一。據他描述，抗戰勝利後，新四軍組織民眾，命令青年當兵，「拆廟宇，毀佛像，用清算的方法，將我們的田算光了。」共產黨要希望去當兵，他趁機南逃。⁵⁶比丘尼常安所在的蘇北小廟難以為繼，她也不得不南下。常安，蘇北鹽城人，15歲落髮為尼。22歲，她的師父圓寂，留下她和師祖無塵兩人，她實際上成了小廟的當家。常安

⁵² 釋聖嚴，《歸程》（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頁73。

⁵³ 釋聖嚴，《歸程》，頁73-75。關於當時南通的情形，參加蘇北災區屍體掩埋隊的僧人圓明也多有記載，詳見圓明，〈蘇北災區掩埋記〉，《覺群周報》，第32-33期（1947年），頁14-15。

⁵⁴ 釋聖嚴，《歸程》，頁104-105。

⁵⁵ 〈雜感：救救我們！〉，《中流月刊》，第4卷第3期（1946年），頁8。

⁵⁶ 釋昌言，〈兩個學僧的一席話〉，《覺群周報》，第11期（1946年），頁12。

的小廟是名副其實的「小廟」，只有兩個人。1947年，國共內戰白熱化後，蘇北社會廣泛流傳：「八路軍要殺和尚尼姑的，還要沒收廟產！」釋常安萬分恐懼，她匆匆攜帶了一些財物和幾尊菩薩逃到上海。作為一個比丘尼，她在佛教界的地位比僧人低微。她既沒有釋真華幸運，有師兄好友的收容。她的小廟也沒有釋聖嚴在狼山的小廟有財力，可以在上海開辦下院。從蘇北到蘇南，她孑然一身，無處可去。只能到殯儀館裡「掛單」，替喪事人家念經做佛事。⁵⁷ 按照佛教的習俗慣例，一般比丘尼做佛事的限制比僧人要多。比丘尼不能舉辦水陸法會等大型佛事，也不能單獨放焰口，她們的單資（做佛事的薪酬——筆者注，下同）比僧人低。⁵⁸ 常安來滬時，正是上海佛事的好時期，內戰的煙火尚未影響到大上海，這裡依然有摩登的文化，紙醉金迷的生活和熱衷經懺佛事的百姓們。雖然她只是一個普通的經懺尼，不到一年，也戴起金戒指，穿上了新袈裟。⁵⁹

抗日戰爭結束後，蘇州佛事市場日漸興旺，當初還俗從業的經懺僧人們重新披上袈裟。這些會做花樣佛事的經懺僧人迎來了一段佛事黃金期。1946年夏，蘇州出現瘟疫。災荒激起人們的原始恐懼，促使他們到佛事中尋求救贖。蘇州大小寺院佛事格外興隆，許多僧人有「時來運轉」之感。⁶⁰

相比戰時，經懺市場總體復甦。但僧團數量的增加導致佛事的競爭日益激烈。許多中小寺院，不僅要應付日益高漲的物價，還要面對同儕以及半僧半佛等遊方僧道的分羹。為了生存下去，各個寺院絞盡腦汁。

抗戰結束後，像釋真華、釋聖嚴和釋常安這樣從江北跑到江南的僧尼不在少數。他們寄居的小廟，多不具備能力舉辦素齋，與靜安寺、法藏寺等大型寺院競爭。小廟要活下去，只能在佛事方式上想辦法。學者邵佳德發現，抗戰時期南來的蘇北僧人豐富了蘇南一代的經懺方式。原來的上海少有「花式」佛事，蘇北僧人到來後，焰口臺上常有齋主點唱民間豔曲兒，僧人做佛事時，也會加上「舞

⁵⁷ 〈變菩薩為穀子〉，《文匯報》，上海，1950年10月17日，版3。

⁵⁸ 「有關蘇州宗教活動問題」，〈安上法師文稿〉，《蘇州西園寺》，蘇州西園寺檔案館藏，檔案號：SZXY2-2-2。

⁵⁹ 〈變菩薩為穀子〉，《文匯報》，上海，1950年10月17日，版3。

⁶⁰ 張夢鵬，〈閒話佛店〉，《蘇報》，蘇州，1946年10月1日，版3。

火球、劈鐃」等雜耍。⁶¹ 南京也出現了「新腔」焰口。記者一隱的叔叔去世兩周年，家人為他請了一堂八眾焰口。據說「是日新調甚多，並加入南京小調，八段景，四州調，玉美人，十杯酒……」連「孟姜女調」都被引入。作者戲謔，為了提升格調，應該在焰口中融入昆曲。⁶² 起初一些寺院尚能自持，不願自降格調，但是物價日益高漲，為了維持生活，凡有佛事，只能來者不拒。⁶³

以花樣見長的小廟和佛店就沒有這種「降格」的思想負擔。事實上，這正是他們的優勢，用來招攬齋主。西園寺僧人安上和尚回憶，1949年前，蘇州經懺花樣很多。有「七個半花旦做」之稱，分別是：水陸普燈（放蓮花燈）、祈課懺悔、結介壇經、大齋王、齋羅漢、蓮花祭奠（手持蓮花燈）、破血湖，最後半個為瑜伽焰口。做這類佛事時，齋主需要額外加襯錢，僧人也會更出力。⁶⁴

南京的中小寺廟更有組織性，他們想到組建經懺聯合會的方法。1946年1月，南京市佛教徒向國民黨南京市政府社會局呈報成立佛教經懺聯合會，但社會局未予通過，理由是該會的章程「與人民團體組織法不合」，要僧人撤回重報。4月，南京市佛教界重新申報。這一次他們將經懺聯合會的章程成功地附會到南京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行的戶政工作上，積極表態：「該會一旦發現形跡可疑之人，馬上向官廳報告。」經懺聯合會還制定專門的身份證件，以備識別。⁶⁵ 1946年7月16日，經過半年的調整，南京經懺聯合會終於成立。該會明確規定：「未登記入會及佩戴證章者，一律不得在南京從事經懺道場事務，否則即可由員警廳

⁶¹ 邵佳德，〈近代中國佛教的地緣性特徵：以蘇北僧人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9年11月），頁155。汪曾祺在小說《寺與僧》（應該是名著《受戒》的前身）中描述過蘇北的飛鐃：「是用兩片大鐃耍出許多花樣。或讓他在手指頂上的溜溜轉；或嘩刺刺擲向半天，用手或鐃接住，反身背手，丟擋叉腰，百無一失。這玩意城裡大戶人家不興，大廟裡和尚也不會。做盂蘭會的多是湖西和尚。這能飛鐃的和尚又必皆會吹笛拉胡琴，唱百種時調小曲。這在盂蘭會人神共樂時用得著的。」「劈鐃」和「飛鐃」差不多。汪曾祺，〈廟與僧〉，《大公報》，上海，1946年10月14日，版12。

⁶² 一隱，〈新腔焰口〉，《南京晚報》，南京，1946年5月27日，版3。

⁶³ 釋聖嚴，《歸程》，頁110。

⁶⁴ 「有關蘇州宗教活動問題」，〈安上法師文稿〉，《蘇州西園寺》，檔案號：SZXY2-2-2。

⁶⁵ 「為據承報擬佛教經懺聯合會會章的批文」（1949年4月27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1003-3-1090。

協助驅趕。」⁶⁶ 該會最重要的目的恐怕不是協助政府的戶政工作，而是「拉幫結派」，組建南京經懺佛事壟斷機構，排除外來遊方僧道等「異己」。⁶⁷

常州的道士們也利用宗教社團的方法維護自己在經懺市場上的利益。1947年9月8日，武進縣道教會會長楊鶴立給武進縣政府寫信，控告僧人志開等從事道教專屬的經懺事宜。據稱，1947年農曆七月初十和十一日兩天，僧人志開先後在武進縣高家塘、萬家塘等地，率領眾僧為人打太平公醮並貼符朝灶。⁶⁸ 楊鶴立認為釋道兩家自古界限分明，向有規定，僧人不得畫符打醮，「業務互不侵犯」，志開的行為不僅違背佛教慣例，更侵犯專屬道教的儀式權利。他對此表示強烈抗議，希望武進縣佛教會和武進縣政府能夠禁止僧人打醮。⁶⁹

楊鶴立對釋志開的控訴和當時蘇南民間佛事市場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以上海為例，每年農曆七月，上海居民都會打太平公醮（道家儀式）。因時間相近，也有人將太平公醮和盂蘭盆會等同。後者是佛教的節日。參加公醮的既有僧人也有道士，既有僧道兩家的樂隊，還有無線電傳送的流行歌曲。太平公醮早已超出單一的宗教範疇，成為僧道文化融合的產物。⁷⁰ 楊鶴立強調太平公醮的歸屬問題，應該從儀式競爭的角度去理解。

負責整理戰後中國佛教會，一直被僧俗兩界視為「革新派」僧人的太虛法師，同樣注重經懺佛事收入對寺院經濟的重要意義。1946年，他為戰後佛教寺僧

⁶⁶ 邵佳德，《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臺北：法鼓山文化事業公司，2017年），頁286。

⁶⁷ 「為奉派出席南京市佛教經懺聯合會成立大會情況的會議報告」（1946年7月24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1003-3-1090。

⁶⁸ 太平公醮：又名清醮，打醮，是一種傳統的道教儀式。在四川、福建、上海、香港、廣東、臺灣等地非常流行。請參見〈太平清醮〉，〈太平清醮〉，收入「香港民風大典」：<https://hongkong.fandom.com/zh-hk/wiki/%E5%A4%AA%E5%B9%B3%E6%B8%85%E9%86%AE>（2022/10/20點閱）。

⁶⁹ 「僧志開率眾為人打醮違反佛教慣例，據情轉請制止免滋糾紛」（1947年9月8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Y1-0000-1-1149-78。

⁷⁰ 天水，〈拓荒集：太平公醮〉，《銀錢界》，第2卷第8期（1938年），頁17；方劃，〈從「太平公醮」說起〉，《太平洋週報》，第1卷第83期（1943年），頁1815。熊月之，《上海租界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281-307。

的經濟建設提出三點意見，其中第3條為「應民眾需求而服務的經懺應由佛教會訂立法規，整理運用，以增經濟收入，同時改善風俗。」⁷¹ 相較於南京和常州等地僧尼借助宗教社團爭取更多的經懺訂購，以及不少小寺廟引入花式佛事愉悅並爭奪齋主的行為，釋太虛的建議不僅注意到物質收入，更兼顧到僧團宗教修行的面向，經濟的收入不應該以修行的廢止為代價。1946年釋太虛對經懺佛事改良以利用的態度，與1921年他在杭州淨慈寺、1926年在上海法苑的做法一致。

蘇州靈巖山寺同樣有效地兼顧了佛事的經濟意義和宗教修行。1926年真達和尚為寺裡定下澤蔭百年的佛事制度，規定靈巖山永遠作為專修淨土宗的道場，「概不講經、傳戒、收徒、應酬經懺。常年念佛」。⁷² 靈巖山不趕經懺、專心念佛的修行方式慢慢在民間流傳開來，往來山上打佛七、參加念佛法會的民眾日多。⁷³ 靈巖山惟行佛七，不做其他經懺佛事的效果頗好，實現了專注宗教修行和獲得經濟收入的雙重目標。

抗日戰爭時期，身處蘇南淪陷區的靈巖山寺，因釋印光個人強大的感召力、住持釋妙真領導有方以及寺中強大的護法團體，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反而成為抗戰時期崛起的寺廟奇跡。上海的護法居士感念寺裡專心修行的宗風，贈田、贈股票的大有人在。寺裡也新購許多田地，江南的幾所小廟加入靈巖山，成為下院。

對戰時崛起的靈巖山而言，1945年抗戰勝利也是錦上添花的喜事。1945年，法幣兌換中儲券的新規，令寺裡收入折損不少。但實物田租為支柱的經濟格局，使寺裡免於紙幣通膨的干擾。事實上，寺裡收回的稻穀，不僅能滿足寺僧和常住居士的伙食開銷，而且每年都有盈餘。寺裡將吃不完的各種糧食轉讓出去，還可

⁷¹ 太虛，〈佛教寺僧的經濟建設〉，《覺群週報》，第7期（1946年），封面頁。

⁷² 〈靈巖寺永作十方專修淨土道場及此次功德碑〉，收入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全集》，第2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頁443。

⁷³ 佛七，又稱打七。可分為「打禪七」和「打淨七」兩種，是禪宗和淨土宗修行的主要儀式。在七日之中，除了必要的飲食和睡眠外，一心持念佛名。靈巖山專修淨土，此處的佛七指七天之內專一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參見周叔迦，《周叔迦大德文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頁34；三重淨宗學會、社團法人華藏淨宗學會編，《印光法師嘉言錄續編》（自印本，2002年），頁71。

獲得大筆收入。加上不菲的佛事收入和各方慷慨的饋贈，靈巖山相當富裕，有餘力舉辦各種義務小學、醫院等慈善機構。1946年正月，靈巖山附設的佛學研究社開課。7月，經吳縣縣政府批准，靈巖山附設的義務小學正式成立，共招收65名學生，日常開銷全部由寺裡負責。⁷⁴

1947年，江北已是戰火頻仍，大量僧尼紛紛難逃。滬上大小寺院糾紛衝突不斷，靈巖山卻安靜如昨。寺裡照常收田租，又新購了幾十畝土地。各項佛事仍然興旺。宗教修行、講經弘法、社會慈善、寺院修繕擴建多管齊下。⁷⁵ 整個寺院的運行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多戰爭的影響。

靈巖山寺不單獨為個人誦經拜懺，而是僧眾修行之餘，順便為香客祈福的方式，成功兼顧了經濟利益和宗教修行。這種修行方式不僅沒有令靈巖山陷入經濟上的困境，反而為該寺吸引大批信徒，來自佛教徒的捐贈和佛七收入讓靈巖山順利度過了抗戰全面爆發初期最艱難的時光，⁷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前，佛七、普佛等佛事收入一直是該寺重要的經濟來源，占據全寺收入的一半以上。⁷⁷

然而，蘇州靈巖山的模式只是個例，絕大多數寺院仍然仰賴經懺佛事收入為生。隨著國共兩黨內戰白日化，蘇南各地雖未直接捲入戰爭，卻也難逃兩黨爭端的波及，軍隊駐寺、借寺院和僧人身分的掩護獲取情報、工人運動等因素給蘇南寺院的經懺佛事造成不小的影響。

⁷⁴ 《靈巖山萬年簿》（1926-1949），靈巖山寺檔案館藏。

⁷⁵ 《靈巖山萬年簿》（1926-1949），靈巖山寺檔案館藏。

⁷⁶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寺裡每年收入四、五萬元，來自田產的進項只有幾百元，而各種佛七、普佛及牌位收入則有一兩萬元。1937年戰爭爆發的第一年，寺裡沒有收到田租，但普通和永年佛七兩項卻進帳一萬多元。這筆資金不僅幫助寺中常住僧人度過了戰爭最艱難的階段，還接濟了蘇州報國寺來山的若干僧俗。參見《靈巖山萬年簿》（1926-1949），靈巖山寺檔案館藏。

⁷⁷ 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宗教志，頁1134。

肆、內戰下蘇南佛事的陰霾（1947-1948）

抗戰之後的佛事復甦，因國共內戰出現陰霾。滬上玉佛、清涼等幾所大廟的佛事受到不小的影響。促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既有軍人佔領寺院的外部因素，也有分配不均導致的僧團內部糾紛。這兩種內外因對滬上經懺的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1949年後。

1946年2月，上海市第十三區公所進駐玉佛寺。最初，區公所只有7個人，借助寺裡部分房間，作為辦公室。後陸續增至十多人，又占用了不少房屋，作為宿舍。這些寄宿寺內的職員及眷屬不守寺裡規矩，經常在廚房殺雞宰鵝，寺裡佛事受到影響。⁷⁸

區公所占用玉佛寺並非個例，滬上受政府官員和軍隊占據的寺廟，不只玉佛寺一家。9月17日下午，上海市民政處處長張曉崧提議，撥用本市寺廟，作區公所辦公處。此議遭到滬上高僧激烈地反對。1946年9月19日，上海300多座寺廟近千位僧人遊行，抗議政府占用寺廟的提議。⁷⁹ 後在釋太虛的干涉下，第十三區公所部分裁員，但沒有完全撤出玉佛寺。

1947年，隨著國共內戰的加劇，國民黨軍隊大量湧入上海，軍隊佔領寺廟的情況更加頻繁。軍隊佔領寺廟，不僅影響到寺裡僧人的日常生活，更直接導致寺裡佛事的減少，有些寺院甚至全無佛事。法藏寺這種大型寺廟也難逃厄運。⁸⁰

1948年，國共戰事日緊，國民黨軍隊過境士兵多駐紮寺廟。上海龍華寺、靜安寺等寺廟常有駐軍，寺裏經懺佛事大受影響，仰賴經懺收入舉辦的各種義務學校、診療所、醫院、施粥所等，只能被迫停辦。國民黨官方對僧人的訴求也不是完全置之不理，負責當局承諾，第七屆全運會閉幕後，陸續出清各寺廟駐軍。⁸¹ 但是戰爭的需求壓倒一切，靜安寺、玉佛寺、法藏寺、清涼寺、龍華寺、莊嚴

⁷⁸ 〈十三區公所強住玉佛寺〉，《大公報》，上海，1946年6月3日，版4。

⁷⁹ 〈一周佛教：上海市佛教徒向市參議會請願〉，《覺群周報》，上海，第11期，1946年，頁9。〈和尚喊民主〉，《文匯報》，上海，1946年9月20日，版3。

⁸⁰ 〈軍人恃強占據慈光義務學校〉，《文匯報》，上海，1947年3月6日，版3。

⁸¹ 〈滬數千僧侶生活受威脅〉，《申報》，上海，1948年5月25日，版4。

寺、議國寺、普濟寺、海潮寺等大小寺院，仍有駐軍，總數約在八九千人。這些人在寺中生活，使得寺裡水電費用陡增，各寺紛紛抱怨無法支撐巨額開銷。⁸²

清末以降，不同軍隊駐紮寺院已是常態，有僧人評論：「軍人喜住寺廟，已成慣例。」⁸³ 軍事、政治革命發生時，滬上大寺如龍華寺等往往成為軍隊的首選。⁸⁴ 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共內戰時期軍隊駐紮滬上叢林道場並非首創。但是，內戰後期，上海新增數千東北、華北、蘇北等地逃難而來的外來僧尼。這些人中有打算在滬上常住的，也有以上海中轉，繼續南下廣州、香港的。⁸⁵ 無論他們計劃如何，暫避上海期間，這些人的日常開銷均由各寺接濟。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反映，軍隊駐紮寺院期間，「經懺佛事全無」。滬上寺院向來以佛事收入為主，無佛事則無進項，加上內戰後期通貨膨脹，物價日益高漲，各項開支陡增，駐軍對滬上寺院經濟的影響大於戰前。因駐軍，許多僧尼面臨生存困境。⁸⁶

除了政府和軍隊占用寺廟這些「外憂」，國共內戰後，影響滬上經懺佛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層出不窮的僧團糾紛。僧團「內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普通僧人和職事僧之間的矛盾，另一個則是寺內的俗家工人和僧人的糾紛。事實上，兩種衝突由來已久，遠非國共內戰時期出現的新事物。但是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黨派勢力的介入，放大了雙方的衝突。

抗戰後期越演越烈的通貨膨脹，並未因戰爭的結束有所緩解，反而不斷惡化。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後，國民黨軍費支出猛增。1947年，美國特使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報告：「國民政府至少有80%的政府預算劃歸軍

⁸² 〈過境軍人借住寺院不勝負擔〉，《申報》，上海，1948年7月27日，版4。

⁸³ 塵空法師，〈朝山日記〉，《正信》，第6卷第23、24期（1935年9月20日），頁13，轉引自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頁273。

⁸⁴ 更多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軍隊駐紮寺院的信息，詳見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頁272-298；侯坤宏，《浩劫與重生：1949年以來的大陸佛教》（臺北：妙心出版社，2012年），頁27-32頁。

⁸⁵ 對於1945-1949國共內戰時期大批僧侶南下逃港的故事，侯坤宏有專文著述。詳見侯坤宏，〈避風港：1949年前後的香港佛教〉，《人間佛教研究》，第7期（2016年），頁97-157。讀完此文後，筆者發現很多南下香港的僧侶以上海為中轉站，可能和滬上相對多元和集中的交通設施有關。

⁸⁶ 〈滬數千僧侶生活受威脅〉，《申報》，上海，1948年5月25日，版4。

費。」⁸⁷ 為了維持下去，國民黨只得瘋狂印鈔。1946年發行的數量已經是抗戰初期的1,192倍。法幣迅速貶值，物價猛漲。1946年，上海的大米漲了15倍，1947年漲了近20倍。⁸⁸ 1948年1月到8月，上海每擔米的價格從150萬跳漲到6,500萬，國民黨的貨幣政策幾乎完全失控。⁸⁹

大環境如此，上海各寺廟不斷提高佛事價格。1946年10月，每位參加佛事的僧人要價萬元左右。⁹⁰ 但是這些收入並不全歸做佛事的僧人所有。事實上，他們只能得到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被寺院住持或監院（寺院總管事）獲得。這種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令出大力卻收穫甚微的經懺僧人頗為不滿。1947年，上海僧人致信《申報》編輯，抱怨生活艱難，希望有人關注他們這些被壓迫者的「呼聲」。這些僧人說，上海幾乎百分之百的寺廟都依靠經懺佛事維持。念經拜懺的僧人們，從早上8點到下午4、5點，念得聲嘶力竭，可收入甚微。1946年底，各寺廟共同訂立的佛事價格是每眾8,000元，參加佛事的僧人單資3,000元。1947年3月，寺廟住持們將佛事價格漲到每眾12,000元，但普通經懺僧的單資沒有上漲，仍然是每人每天3,000元。這些清眾們集體決議，要求按照佛事價目的30%發給單資。這個提議被寺院執事僧拒絕。清眾們自行將單資上漲到每眾每天6,000元。許多寺廟住持大怒，揚言誰敢「加單子」（漲工資），立刻逐出寺院。清眾們不滿住持的驕橫，遂向報紙求援，希望能借輿論壓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準。⁹¹ 僧眾們的抗議最終成功了。⁹²

僧團之間所以會如此「不和合」，與大多數僧尼出家的動機、寺院佛事收入的分配方式緊密相關。

⁸⁷ 楊培新，《中國通貨膨脹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36。

⁸⁸ 熊月之主編，張培德等著，《上海通史》，第7卷民國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54。

⁸⁹ 熊月之主編，張培德等著，《上海通史》，第7卷民國政治，頁469。

⁹⁰ 〈廟寺庵院僧尼做佛事亦告漲價〉，《新聞報》，上海，1946年10月24日，版4。

⁹¹ 「單子」又稱「單資」，僧人做佛事時獲得的酬勞。大同，〈上海市佛教會會議錄 第十次常務會議紀錄〉，《覺群週報》，第45-46期（1947年），頁9；〈出家人也來個呼聲〉，《申報》，上海，1947年5月29日，版7。

⁹² 大同，〈上海市佛教會會議錄：第十七次常務理事會及中國佛教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會代表團會議紀錄〉，《覺群週報》，第47-48期（1947年），頁11。

蘇南的經懺僧人大致有兩種，其一是寺院的常住僧，其二是無固定住所的客僧。唯慈發現，民國時期以寶應、江都、如皋、鹽城為四角組成的平行四邊形區域，堪稱「僧人的搖籃」。蘇南一半以上的僧人都來自這片地域。他認為，此處多僧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貧窮，而是此地有尊重僧人、寺院的風俗民情，做和尚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⁹³ 美國學者張倩雯（Rebecca Nedostup）則認為，蘇北的和尚大量湧入蘇南和上海的寺院，不僅因為江南的寺院可以提供嚴格的佛教儀軌培訓，更因為江南經濟繁榮，僧人可以獲得更多的物質回報。僧人的流動可被視為近代江南經濟移民的重要組成部分。⁹⁴ 無論地方風俗和經濟回報哪個比重更高，不可否認，經濟因素是許多僧人出家的重要原因。

除了正規僧人，蘇南一帶還有許多遊方僧，這些僧人沒有固定住所，和碼頭小工一般，可以隨時叫雇。⁹⁵ 對於這些遊方僧而言，經懺佛事和信仰沒有多大關係，只是他們賺錢謀生的一種方式而已。這些專門應付經懺的「客師」沒有種種戒律的限制，只要有一頂袈裟，一件僧袍，能念普通的經懺就可以，拿到的薪酬往往比常住寺院的普通僧人還要多。他們在幾處寺院掛單，哪裡有需求，就去哪裡應付。每人每個月除了向佛店老闆繳納一定的房錢，其餘收入都是自己的。⁹⁶ 上海的遊方僧有兩大集中地，一處在新聞路斯文裡，一處在汶林路。斯文裡的和尚都有家室，汶林路的經懺僧則多單身。他們合租一個房子，過集體生活。這兩處的僧人，完全依靠經懺為生。⁹⁷ 蘇州也有類似的情況，由當家和尚租賃民居或者客棧，供趕經懺的僧人居住。僧人按月繳納食宿費用，叢林道場人手不夠時，也會來堂室雇人。⁹⁸

⁹³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頁13-16。

⁹⁴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2.

⁹⁵ 蘭因，〈租界上的和尚〉，《申報》，上海，1929年10月14日，版21；久操，〈佛店〉，《中國商報》，上海，1940年11月26日，版5。

⁹⁶ 更生，〈職業生活：阿彌陀佛的生活〉，《新生周刊》，第2卷第14期（1935年），頁12-14。

⁹⁷ 無佳，〈上海趕經懺和尚的兩大集中地〉，《上海特寫》，第26期（1946年），頁5。

⁹⁸ 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宗教志，頁1133；「有關蘇州宗教活動問題」，〈安上法師文稿〉，《蘇州西園寺》，檔案號：SZXY2-2-2。

考慮到佛事收入對於大多數僧人的經濟意義，滬上普通僧人因佛事薪酬與寺方執事僧發生不小的衝突，並利用黨派鬥爭實現個人利益，也就容易理解了。但是，也不應該單方面地譴責經懺僧人只顧利益，不顧僧團和合的大局，正如抗議僧人所說的，不少寺院對經懺收入的分配方式確實不甚公平。

很多普通寺院的僧人從佛事中獲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些充數、打雜的小和尚，他們的人頭費直接被廟裡拿走，分不到薪酬。⁹⁹ 釋聖嚴形容他在靜安寺趕經懺時，每月所發的單銀，只能買幾塊肥皂，想買一本詞典，要存上好幾個月的錢。¹⁰⁰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物價飛漲，上海和蘇州等地的寺院紛紛增加懺資。普通僧人的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他們工資增加的幅度遠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許多僧人日常僅有「兩稀一乾」的清苦生活。¹⁰¹ 天寧寺住持證蓮回憶，以前寺裡打開山門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出家人的屍體躺在門前，這些都是無錢的普通經懺僧人，唯望天寧寺布施柴火將其火化。¹⁰²

寺院裡職事的生活則富裕悠閒得多。絕大多數時候，佛事由清眾完成，不參與具體儀式的寺中職事卻可以從中提成，且收入往往占據大頭。例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上海法藏寺白天和晚上的佛事定價分別為1元和2元，參加佛事的普通僧人分別能獲得25分和40分的提成，每天可收入65分，其餘的收入和素齋提成由執事僧月底平分。¹⁰³ 也有的寺院一場定價1.5元的佛事，清眾只能拿2角錢薪酬，其餘的1.3元加上素齋所得的進項，除了職工薪金和必要的伙食費，全部歸寺中當家所有。¹⁰⁴ 如果方丈參加佛事，還可以得到一筆額外的酬勞。天寧寺方丈描述，他參加普佛法會得到的襯金，是其他和尚的10倍。除了固定的單資，做

⁹⁹ 釋聖嚴，《歸程》，頁125。

¹⁰⁰ 釋聖嚴，《歸程》，頁136。

¹⁰¹ 「兩稀一乾」，兩頓稀飯，一頓乾飯。〈上海市各寺院聯合公〉，《申報》，上海，1940年10月10日，版6；〈蘇州僧界再漲經懺視資啟事〉，《蘇州新報》，蘇州，1940年11月1日，版2；〈蘇州各僧寺院增加經懺視資啟事〉，《蘇州新報》，蘇州，1941年4月2日，版1；〈滬上百物飛漲影響緇素生活〉，《申報》，上海，1942年3月20日，版4。

¹⁰² 釋聖嚴，《歸程》，頁111。

¹⁰³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上），頁272-277。

¹⁰⁴ 當家又稱監院，是寺院中僅次於方丈的「二把手」。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上），頁18。

完佛事後，他還能夠獲得齋主額外贈給的香儀和供養的果儀。¹⁰⁵ 因此方丈和當家的收入要遠遠高於普通僧人。上海一些寺院普通班首職事的工資平均每個月也有15-30元。¹⁰⁶ 雖然戰後佛事價格不斷提高，但增加的部分都落入寺中職事僧囊中。這種情況導致普通僧眾和住持、當家等寺院職事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寺院裡常常因資金分配不均發生糾紛。

除了佛事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僧團糾紛，另外一些僧人，為了維護個人利益，將私人恩怨與國共兩黨派系鬥爭聯繫起來。

1947年8月19日晚，有20多位僧人、六七個穿制服的國民黨軍人，來到上海清涼寺。他們大聲指控住持雪煩有漢奸嫌疑，不是廟裡的正統和尚，應該讓位，由他們重新主持常州和上海清涼寺上下院。這20多人的領頭人物是釋心靈和釋岫嶺兩僧。清涼寺知客僧說，他們二人曾經是常州清涼寺的常住僧人，因不遵守寺規，被逐出山門。¹⁰⁷ 釋雪煩見對方來勢洶洶，當即派人通報江寧路員警分局。該局司法股派員勸解釋心靈等人，後者隨後離開。第二天上午7點，釋心靈等人再次到清涼寺抗議，釋雪煩只得再次報警。雙方各派代表一名到警察局調解。雙方各執一詞，警察局見和解無望，直接告訴他們到別的地方說理。如果認為釋雪煩確有漢奸嫌疑，對方大可向地方法院檢舉。至於釋雪煩是不是清涼寺的正統和尚，雙方也可以到佛教會裡去判斷。¹⁰⁸

兩派人馬來到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釋心靈等人提出兩個條件：第一，讓他們回寺居住；第二，釋雪煩必須賠償心靈等最低限度1,000萬的損失費。清涼寺答應賠付500萬元，但堅決不同意他們回寺居住。雙方再次談崩。釋心靈等第三次登寺抗議，清涼寺開會議決，絕不同意他們重新回寺的要求。¹⁰⁹ 之後他

¹⁰⁵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上），頁209、247。

¹⁰⁶ 更生，〈職業生活：阿彌陀佛的生活〉，《新生周刊》，第2卷第14期（1935年），頁12-14。

¹⁰⁷ 〈和尚密告和尚〉，《大公報》，上海，1947年9月6日，版4。

¹⁰⁸ 〈佛堂險成戰場 一批遊僧和著制服者圖佔清涼寺〉，《大公報》，上海，1947年8月21日，版4。

¹⁰⁹ 〈上海清涼寺都監玉泉監院 純如靈光暨全體僧眾緊要啟事〉，《申報》，上海，1947年8月23日，版3。

們又到新中國建設協會調解，寺方口頭應允酌情增加部分津貼，但釋心靈等人仍然不滿。三次調解未果，放棄和談。

就在雙方談判陷入膠著時，國民黨鎮江城防部在焦山寺破獲了一個秘密電臺。1947年春來滬之前，釋雪煩在焦山已經做了八、九年的住持。釋心靈一行聽到焦山電臺之事，抓到把柄，緊急密告上海市大場員警分局，說上海清涼寺住持僧雪煩就是焦山定慧寺（簡稱焦山）住持。對此重要「敵情」，警局不敢怠慢，隨即派二十多名便衣員警前往清涼寺包圍搜查，但未查到具體證據。9月4日早晨，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華美晚報》刊登了一條新聞：「鎮江城防守備部在焦山寺破獲匪大型電臺，主犯系主持僧雪凡及共匪羽黨六人，均已逮捕。」直到華美的新聞發佈之後，清涼寺三位執事僧雪煩、純如、靈光三個僧人才被扣押。諷刺的是，釋雪煩三人被捕不久，釋心靈等人也被抓去問詢。¹¹⁰

釋雪煩等人入獄期間，滬上兩大報紙《申報》和《大公報》紛紛報導，《華美晚報》所刊之「雪凡」和清涼寺住持雪煩的名字同音不同字，應該不是同一人。《大公報》記者特意到上海清涼寺採訪，該寺知客僧告訴記者，不知道鎮江城防守備部逮捕的雪凡究竟是哪一個。釋雪煩早已不是焦山寺住持，現任住持另有其人。釋雪煩最近也沒有到鎮江去過。因此種種，釋雪煩被關押十七天後無罪釋放，雙方糾紛不了了之。

事實上，釋心靈等人的判斷沒有錯，兩個雪煩就是同一人。釋雪煩，原名劉培基，1909年出生於江蘇泰興。14歲在蘇北海安縣曲塘鎮報本庵出家為僧，是鎮江佛學院的發起人之一。1939年以後，擔任焦山方丈。抗日戰爭時期，掩護過新四軍和中共地下黨員彭炎夫妻。雪煩和新四軍的聯繫還要追溯到他的前任方丈靜嚴。釋靜嚴，原名陳炎，蘇北興化人。1934年到焦山擔任監院，兩年後成為焦山方丈和佛學院院長。他是鎮江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又是青幫「通」字輩重要成員，與鎮江工商界頭面人物陸小波等人關係密切。抗日戰爭期間，焦山是南京汪精衛政權高官們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許多政府官員皈依住持釋靜嚴。¹¹¹ 鑒於

¹¹⁰ 〈和尚密告和尚〉，《大公報》，上海，1947年9月6日，版4。

¹¹¹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Huai, 1931-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p.233. 轉引自學愚，《佛教、暴力與民

釋靜嚴的重要地位和廣泛的社會關係，新四軍暗中將其吸納為中共黨員。因釋靜嚴的庇護，抗日戰爭時期，焦山成為新四軍重要的據點，許多重要會議都在該寺召開。日軍清鄉期間，新四軍許多高層幹部在該寺躲避。¹¹² 作為釋靜嚴的繼任者，釋雪煩也協助和庇護過新四軍。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以「通匪」的罪名，將其投入監獄。¹¹³ 釋雪煩很快就在釋靜嚴好友陸小波的幫助下出獄。後經鎮江金山寺住持太滄和尚的推薦，成為常州和上海清涼寺上下兩院的住持。¹¹⁴

釋靜嚴和釋雪煩的故事並非一例，民國時期共產黨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就開始利用寺廟和僧人打掩護，秘密探聽情報。

1931年3月13日，國民黨安徽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兼宣傳部長寧坤密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稱共產黨近來以寺廟庵堂為反動根據地，請國民政府下令各級政府嚴加注意。此信息最初來源於黃埔畢業生黨員夏英煦。夏是安徽桐城人，畢業於黃埔學校，供職於湖北省保安隊。接到電報稱老父患病，情況非常危險，於是請假回皖省親。2月22日乘坐怡和隆輪船回家。他住在3號船艙，隔壁艙內住著四位青年男女。夏說，他因思慮家人，夜不能寐。夜間1點左右忽然聽到2號艙內男女談心，連稱妙計。他心中有疑，剛好艙內有一廢棄的電燈洞，乃起身就坐。聽聞一男子發問：「汝等此次赴下游執行重大計畫，何時可以聞？」另一個男子說：「現在敵方力量太大，氣焰太高，實在難以達到目的。所擬定的方針，則在宣傳入手，然而地方檢查非常嚴格，容身之地極感困難，遑論宣傳。故此次政府頒布密令，先就寺廟庵堂入手，方法就是以大批金錢買動和尚尼姑，

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頁300-301。學愚應該是將靜嚴誤寫為「靜正」。

¹¹² 錢凱，〈靜嚴法師和中共長江工委〉，收入政協丹徒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丹徒文史資料》，第7輯（丹徒：政協丹徒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2年），頁138-155。

¹¹³ 汪偽政權高官考試院院長江亢虎和外交部長褚民誼和釋雪煩交往甚密。焦山為江專門準備了房間，以備他避暑之用。參見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頁337。1944年，偽中國佛教會籌備會在南京毗盧寺舉行成立大會，屆時推舉褚民誼名譽理事長，江亢虎為顧問，焦山住持雪煩被選為常務理事。這也是釋雪煩「通匪」的罪證之一。「中國佛教會籌備會成立在首都毗盧寺舉行成立大會」（1944年1月5日），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1022-1-880-5。

¹¹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近代江蘇宗教（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0年），頁158。

以便暫借寺廟為容身之地。然後又以大批金錢輔助和尚召集善男信女及無業遊民，假講經念佛之名暗中宣傳本黨主義。以寺廟庵堂為根據地，並以善男信女和無業遊民為忠實黨徒。一遇到時機，你們就可達到良好的目的。現在敵方對此當無所預防及檢查。」他聽到對方說「敵方」、「政府」、「本黨主義」、「根據地」、「忠實黨徒」等語，認為這是共產黨的慣用說法，立刻將此信息上報。3月2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密令內政、軍政兩部，通知下屬各省市及各軍對寺廟等地嚴密防範。¹¹⁵

1933年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後，蔣介石對寺廟等地格外留心。他電告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密切關注江蘇省會鎮江的動向，特別要偵察交通機關碼頭輪船客店和寺廟的情況。¹¹⁶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停止借用寺廟和僧人作掩護，所以才會有鎮江焦山住持靜嚴被發展為地下黨，焦山成為共產黨秘密基地的故事。

1946年國共內戰開始後，雙方為了取勝，更是不惜一切代價採取資訊和情報。在一個「諜影重重」的時代，寺廟和僧人身分更有優勢。對此兩黨均有共識。雙方在佛教領域的情報戰給寺院的穩定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也限制了部分寺廟的佛事。

1946年，首都南京員警廳發現，南京市內各寺院和工廠，均有共產黨隱匿的痕跡。¹¹⁷1947年4月，吳縣警察局局長趙維峻也收到相關通知。4月2日，江蘇省保安司令部電告吳縣警察局：「淮北區政委鄧子恢假借安徽泗南佛教會組織掩護情報工作，數日來派出多人外出打探消息。他們身著僧服，假扮和尚，在京滬線各縣城刺探軍政情報。他們之間有秘密的聯絡信號，在上衣鈕扣處別有扣針一個，口號為『……』（原文字跡模糊——筆者注）答『楊』。」¹¹⁸1947年5月，

¹¹⁵ 「行政院長蔣中正密函」（1931年3月20日），〈華中各省共產黨活動案（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4500-00012-027。

¹¹⁶ 「蔣中正電陳果夫」（1933年11月27日），〈勾結閩逆叛變（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010-258。

¹¹⁷ 〈查有奸徒匿跡〉，《南京晚報》，南京，1946年12月21日，版4。

¹¹⁸ 「奸偽假借佛教組織名義掩護情報工作仰切實注意」（1947年4月2日），蘇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I3-3-166-89。

為了擺脫「通匪」的嫌疑，吳縣佛教會主動請纓，請求吳縣政府下令，要求本縣境內各未加入佛教會寺廟之教徒，迅速入會領取章證。飭令境內各寺廟教徒未入會者，一律責令入會。今後吳縣佛教會將逐一查驗境內各寺廟教徒入會之身份章證，如有未入會者，隨即責令入會，取證備查，借明身分而資防範。¹¹⁹ 國民黨的防範，自然包括注意出入寺院的人員。尋常百姓沒有人願意因為一場佛事捲入到某些政治事件中。這無疑會影響來寺的香客和齋主數量，從而影響到整個寺院的經懺訂購量。

但僧團也不完全是國共兩黨爭端的受害者，利用黨派爭奪經懺市場也大有人在。1947年，為了排擠小廟或者佛店裡的客僧，爭奪更多的佛事，不少大寺院的住持集體加入國民黨。¹²⁰ 這樣更容易獲得執政黨的信賴和關照，減少從事各項經懺佛事的阻力。

除了僧團內部人事受黨派糾紛的影響，寺裡俗家工人和寺院執事僧的糾紛，也有一些與國共兩黨的派系鬥爭緊密相關。僧俗混亂又直接影響到寺院的經懺佛事及附屬產業如素齋的發展。

一般來說，在金山、天寧寺等十方叢林道場，因常住和雲水僧數量眾多，為了維持僧團有序地運轉，或是減輕僧人外出趕經懺時的負擔，大多會雇請一些俗家工人，這些人被統稱為香伙。他們平常打掃佛殿，有佛事時，代替僧人挑經擔、保管法衣法器等。¹²¹ 香伙並無固定的薪酬，但有一些小費。以鎮江金山寺為例，20個茶房，但凡為施主服務的，一般都能獲得一些小費。拿不到小費的人，也可以在齋主前來做法事時，根據年齡大小，得到一兩個銀元的布施。這筆錢比誦經僧人的報酬還多。¹²² 天寧寺香伙的收入方式與金山的茶房類似。¹²³ 除

¹¹⁹ 「責令各寺廟教徒一律加入佛教會以明身份而利防範由」（1947年5月27日），蘇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I3-3-132-164。

¹²⁰ 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宗教志，頁1134。

¹²¹ 汪仲賢，《上海話俗語系列——上海俗語圖說續集》（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13。

¹²²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55-56。

¹²³ 「關於常州市佛教工作上幾個問題的反映和我們的意見」（1953年4月15日），常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14-1953-1-3-153。

了打雜幫忙的小工外，在修建殿宇、傳戒等特殊時期，寺裡還會特意請來幾位裁縫和理髮師。天寧寺常住裁縫有15位，加上長年在寺內打雜的小工，總數高達200多人。香伙與常住僧的比例大概為1：4。唯慈採訪過一位在天寧寺從業12年的裁縫，據他說寺中俗家工人的待遇很好，有舒適的房間，與僧人相同的免費伙食。能夠成為天寧寺的一員，他深感榮耀。¹²⁴

上海寺院的香伙與金山、天寧寺的情況略有不同。滬上大寺院多提供素齋。抗戰之後，靜安、法藏等大寺院有以素齋帶動經懺的趨勢。這些寺院動輒舉辦數十席的素筵，寺中僧眾根本忙不過來。出於業務上的需要，寺裡大多雇傭俗家茶役（茶廚工人）。這些茶役並無固定底薪，收入全賴顧客給的「加二小帳」。¹²⁵

1946年底，滬上寺院已經有茶廚會。上海市佛教會專門討論過如何應對茶廚工人入會事宜。他們的決定是由各寺對茶廚工人說明入會之利害。¹²⁶ 不過，這個方法應該不甚有效。1947年後，寺院工人和寺方糾紛日漸增多。7月，上海各寺廟茶廚工人向上海佛教分會提出增加增加底薪、僧眾不能再分享素齋小帳的要求。¹²⁷ 11月，桐柏宮、玉皇山、濟虛觀、大茅山、白雲觀等五家道觀的職工亦集體抗議，要求上海市社會局改善待遇。¹²⁸ 12月，茶廚工人再提改革，要求寺裡發放3個月的年賞。¹²⁹

為什麼1947年後雙方的衝突越來越多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1947年，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一擔米要幾百萬的情況下，許多素齋不那麼興盛的小廟茶役，很難拿到足夠的小帳維持生活。¹³⁰ 但是，這並不足以解釋為什

¹²⁴ 艾術華（J. Prip Moeller）說寶華山的俗家工人住所相對簡陋。參見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佛教制度》，（上），頁21-28。

¹²⁵ 所謂「加二小帳」，是指顧客在菜金基礎上增付20%的服務費。上海商業（1949-1989）編輯部編，《上海商業（1949-1989）》（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747。

¹²⁶ 大同，〈上海市佛教會會議錄 第十次常務會議紀錄〉，《覺群週報》，第45-46期（1947年），頁9。

¹²⁷ 〈寺廟茶廚工人糾紛〉，《大公報》，上海，1947年7月13日，版5。

¹²⁸ 〈素齋茶廚職工〉，《大公報》，上海，1947年11月13日，版5。

¹²⁹ 〈年賞糾紛 又有兩起〉，《大公報》，上海，1947年12月25日，版4。

¹³⁰ 〈年賞糾紛 又有兩起〉，《大公報》，上海，1947年12月25日，版4。

麼1947年會成為轉折點。大概從1941年底開始，淪陷區的通貨膨脹已經非常嚴重。那時並不見茶役和寺方的抗爭。事實上，上海許多寺院茶廚工人的工資比普通的經懺僧還要高。1947年，上海市佛教分會拒絕滿足工人的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佛教會認為：「目前各工人每月收入可得百餘萬元，已較寺廟職僧為優。故對工人要求確定五元、十元、十五元之底薪，礙難實行。」¹³¹

佛教會的理由並不完全是強詞奪理。以滬上名寺靜安寺為例。1946年，聖嚴在靜安寺讀書。據他描述，寺院常住和佛學院學僧的開支，全靠經懺佛事。佛事收入不僅包括做法事所得，還有附帶的素齋及租廳開吊等。佛事的收入是固定的，後兩者才是主要來源。¹³² 茶役從素齋中抽取提成，素齋收入越高，他們所得越多。經懺僧人的單資卻是固定的。工人的工資高出經懺僧的說法可信度很高。1947年，靜安、法藏等寺院的年收入仍然很高，差不多在「二萬萬以上」。以至時人暗諷「百業頹廢，只有佛店生意興隆」。¹³³ 因此，筆者認為通貨膨脹只是1947年後工人和寺裡糾紛的表層原因，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的指導，才是1947年後茶廚工人和寺方衝突日多的根本原因。

1945年8月，日本剛一投降，中共地下黨已經緊鑼密鼓地接管汪偽酒菜業工會。共產黨在上海酒菜業的根基已久。1942年，羅添、朱剛和甘田等人，以滬上名店南國酒家為基地，創辦「南國酒家廚房圖書館」，宣傳新四軍的活動，秘密培養共產黨員。1945年9月12日，甘田等人率先接管「上海特別市酒菜館業職業工會」（即汪精衛政府的酒菜業工會），成為酒菜業工會的實際領導者。1946年1月，姍姍來遲的國民黨接收大軍想要重奪上海酒菜業工會領導權，奈何甘田等人在此經營已久，組織工人頗為得力，國民黨無計可施。1946年4月3日，酒菜業工會重新成立，國民黨雖然也塞進了幾個人，實際領導權一直掌握在共產黨手中。¹³⁴ 1947年後，滬上寺院茶役多加入素齋茶廚工會，有組織地不斷向「資

¹³¹ 《寺廟茶廚工人糾紛》，《大公報》，上海，1947年7月13日，版5。

¹³² 釋聖嚴，《歸程》，頁135。

¹³³ 逸棠，〈佛店生意興隆〉，《誠報》，漢口，1947年1月13日，版4。

¹³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編，《上海酒菜業職工運動史料》（自印本，1988年），頁2-5、41-57；劉明遠、唐玉良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1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頁434-435。

方」挑戰。素齋茶廚工會是酒菜業工會下屬分支。酒菜業工會實際負責人甘田是共產黨員，他發動寺廟茶廚工人反對寺方「資本家」的概率頗高。這種衝突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只不過國民黨統治時期，香伙們雖然加入工會，但衝突多以寺方占利告終。¹³⁵ 政權更迭後，僧人往往成為弱勢的一方。

1947至1948年，國共兩黨雖未在蘇南開展大規模的戰爭，國民黨軍隊駐寺和國共兩黨鬥爭已經已經日漸影響到蘇南僧團的生活。1948年情況更糟，一直平穩發展的靈巖山也受到干擾，收租困難。¹³⁶

沒有固定田產，完全仰賴經懺的小廟日子越來越難過了。1948年，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佛事相關用品也不斷漲價。上海各類佛事用香的價格已經高得「駭人」。1948年春季香汛期間，老山香每擔9,000萬（金圓券），紅熟揀枝香8,200萬，黃地門香2,800萬，三星玫瑰香2,500萬，大條香2,200萬，蘇木1,500萬。價格昂貴，各香店生意清淡，為了不折本，只能繼續提高香料價格，導致一種惡性循環。¹³⁷ 此時的通膨與1946年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蘇南許多中小寺院，香火日漸寥落。連向來不愁吃喝的上海僧人，也開始販賣僧衣。1948年8月，一次廟會上，有個老和尚將破舊袈裟，及殘缺經典、木魚、念珠等，傾筐倒篋以出之，只為換得一日溫飽。¹³⁸

1948年10月底，共產黨已經取得濟南戰役和遼沈戰役的勝利，國共內戰的整體形勢發生逆轉，國民黨優勢不再，雙方進入決戰環節。11月，共產黨發起淮海戰役，1949年1月下旬，共產黨接管蘇北一批重要集鎮，例如海安、如皋等。2月，共產黨又先後拿下南通和儀徵。13日，中國共產黨華中工委發布了《關於

¹³⁵ 1947、1948年的數起糾紛，均以俗家工人的妥協告終。參見〈寺廟茶廚工人糾紛〉，《大公報》，上海，1947年7月13日，版5；〈素齋茶廚職工 要求改善待遇 至今還沒有結果〉，《大公報》，上海，1947年11月13日，版5；〈法藏寺開除茶役〉，《大公報》，上海，1948年4月19日、20日，版4。

¹³⁶ 《靈巖山萬年簿》（1926-1949），靈巖山寺檔案館藏；釋真華，《參學瑣談》，頁124-131。

¹³⁷ 香價按照當時國民黨金圓券的標準。《沒落的檀香業》，《大公報》，上海，1948年3月31日，版6。

¹³⁸ 〈凌霄汗閣談薈〉，《申報》，上海，1948年8月1日，版8。

渡江作戰之前工作的指示》，戰火由蘇北燒入蘇南已是必然之事。¹³⁹ 4月21日凌晨，共產黨分三路大軍渡江。戰爭對蘇南僧團和經懺佛事的衝擊更為直接。

伍、大動盪時期僧團劇變（1949年1-9月）

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南渡長江。23日，以南京為起點，蘇南各地陸續為中國共產黨掌握。5月1日，蘇南行政公署成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正式成為這裡的新主人。¹⁴⁰ 國共易幟的大動盪期間，蘇南的僧眾的命運著實經歷了一番波折。

蘇北各地陸續為共產黨占領後，面對時局的巨變，蘇南的民眾頗為驚慌。他們在國共兩黨的砲火中流竄，試圖尋找一片平安的土地。1949年初，真華還在靈巖山當知客僧，他親見南京易幟前後，潮水般的難民如何「相互交流」。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地的居民向上海逃亡，而上海的居民又跑向內地。時局的鉅變給蘇南寺院和僧人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共產黨渡江之前，不少佛教刊物對其轄區內佛教寺院和僧尼處境多有報道。其中不乏共產黨占領寺廟、徵借糧食等消息。以太虛在上海玉佛寺創辦的《覺群周報》為例。1947年，該刊轉發承德、太原相關的佛教信息。文稱承德八大喇嘛廟多被共軍摧毀，闔無烟火，各廟喇嘛，缺衣少吃。已被列入難民救濟之列。佛教聖地五臺山也遭到「洗劫」，年輕僧人被迫還俗，廟宇被占，各寺廟金銀器皿多被抄收，全部佛像化作熱銅30萬斤等等，「聖地至此已告毀滅」。¹⁴¹ 這些佛教報刊在江南一帶廣為流傳，應該對蘇南民眾特別是佛教徒產生不小的影響。

¹³⁹ 孫宅巍、王衛星、崔巍主編，《江蘇通史：中華民國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頁519-521。

¹⁴⁰ 孫宅巍、王衛星、崔巍主編，《江蘇通史：中華民國卷》，頁543-546。

¹⁴¹ 〈一周佛教承德喇嘛廟遭共軍摧毀無遺〉，《覺群周報》，第51-52期（1947年），頁7；〈二周佛教太原〉，《覺群周報》，第51-52期（1947年），頁7；〈一月佛教太原〉，《覺群周報》，第57期（1947年），頁7；〈二周佛教太原〉，《覺群周報》，第51-52期（1947年），頁7。

受時事影響，靈巖山的數百僧眾已無法安心修道。最先離開的是佛學院的學僧。1948年剛剛擴建的佛學院，幾乎流於解散。¹⁴²雖然方丈妙真百般挽留，礙於時局，許多僧人還是毫不猶豫地離開了。¹⁴³

渡江之後，共產黨也將其在「解放區」的部分宗教經驗帶到蘇南，借糧就是重要的一項。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後，先後兩次向靈巖山借糧，夏季借白米25,000斤，麥子100多石。10月秋徵開始，蘇州市政府要求寺裡最少繳納淨穀18萬斤。靈巖山將寺中所存各種糧食折合成淨穀5萬斤，全部交給政府。政府還要求寺裡補齊1948年的糧稅，共21,227斤。交罷糧食後，寺中所剩餘糧僅能維持20天。齋廚蕭索，寺僧離去者占十分之三四。剩下的200多位僧人每日兩頓稀飯，勉強維生。寺裡掛起了「止單牌」，停止接收外來遊方僧。¹⁴⁴

1949年，靈巖山收租大減，解放軍幾次借糧，寺中幾乎出現糧食危機，但佛事收入和香客供養仍然不菲。頗為有趣的是，這一年，齋主們供養的金額首次超過田租、佛事等各項大宗收入，成為寺裡最重要的經濟來源。¹⁴⁵然而，蘇南其他叢林道場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天寧寺的情形頗為不堪。歷史上，天寧寺與地方中共黨人曾有過節。1927年蔣介石發動清共政變後，武進地區的中共黨員為了保存實力被迫轉入地下活動。惲逸群、張雲鶴等中共支部負責人借助「逸仙中學」作掩護，將活動重點轉移到農村，發動天寧寺佃農進行反租鬥爭。天寧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托請僧人恒海外出周旋。恒海曾在北洋軍隊擔任旅長，軍政兩界頗多人脈。寺裡又借用國民黨武進縣政府和公安局的勢力，逮捕抗租運動的負責人蔣何畏、徐祖英等共產黨員。因減租問題，武進地方中共黨人與天寧寺的衝突持續3年。¹⁴⁶

¹⁴² 孫宅巍、王衛星、崔巍主編，《江蘇通史：中華民國卷》，頁538-539。

¹⁴³ 釋真華，《參學瑣談》，頁165-166。

¹⁴⁴ 《靈巖山萬年簿》（1926-1949），靈巖山寺檔案館藏。

¹⁴⁵ 1949年，靈巖山齋主們的供養數額遠高於佛事和田租收入。供養金共32,031,269元（人民幣）；佛事共14,252,893元，田租只有385,034元。（據寺裡帳本記載，當時金圓券和人民幣的折合比率是277237:1）。參見《靈巖山萬年簿》（1926-1949），靈巖山寺檔案館藏。

¹⁴⁶ 蕭吾，〈恒海和尚傳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近代江蘇宗教（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0

有此前嫌，解放軍在江淮作戰，天寧寺僧眾表現出極度恐慌。1948年以後，天寧寺僧眾兩度離散。先是退居僧人證蓮聽到共產黨即將渡江的消息，急召監院釋敏智到滬密商，兩人先行赴香港布置新道場。不久又返回上海，派人告知天寧寺僧眾：「除非和共產黨內要人有所聯繫，否則性命難保。」釋證蓮等人如此擔憂，很可能是受時局影響的偏見。不過，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出於心理恐慌的揣測同未經證實的傳言一樣，有強烈的幻惑人心的效力。天寧寺負責人釋耀海、釋敏智、釋欽峰等信以為真，立刻乘飛機逃往香港，寺中僧眾聞訊後更加驚慌，迅速散去200多人。4月28日，解放軍佔領常州。29日，天寧寺剩餘的300多位僧徒逃散一空，隱蔽各處，觀察形勢。¹⁴⁷

鎮江、蘇州、上海等地僧團的命運大同小異。1949年前，素有律宗第一山之稱的句容寶華山有常住僧人300多名，戒期全國各地奔湧而來的僧尼居士可達2000多人。1949年後，寶華山有數百僧人星散各地，山上只剩120多人。¹⁴⁸

1931年，不包括靈巖山、楞伽山等郊區寺廟的僧尼數量，蘇州城區有僧人728人。1949年，僧眾人數減少到411人。有300多人離開僧團，另尋出路。¹⁴⁹

民國時期，上海絕大多數寺院仰賴佛事為生，1949年後佛事銳減，大量僧人還俗回家。上海原有僧眾萬餘人，到1949年9月，已經減少8,000人，剩下方丈、執事、僧眾2,000多人。¹⁵⁰ 這年12月，全上海300多家佛教寺廟的2,000多位僧尼又減少40%。離開的僧眾絕大多數還俗回鄉，從事生產。還有幾十人加入中共組

年），頁175-179；「反革命分子欽峰交代書：記農民與天寧寺鬥爭的始末」（1960年6月14日），〈天寧寺佃農抗租鬥爭（1-21）〉，《中共常州市黨史編委會》，常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8-2-1961-45；中國共產黨常州市委員會黨史編輯委員會編，《常州地區革命鬥爭史料（1926-1949）》，第1集（自印本，1961年），頁86-97。

¹⁴⁷ 「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1959年2月12日），〈天寧寺佃農抗租鬥爭（22-53）〉，《中共常州市黨史委員會》，常州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8-1959-2-2-50。

¹⁴⁸ 花妹，〈隆昌寺廟產知多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句容文史資料》，第9輯寶華山隆昌寺專輯（句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年），頁106。

¹⁴⁹ 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宗教志，頁1134。

¹⁵⁰ 〈上海寺院〉，《弘化月刊》，第5卷第100期（1949年），頁8。

織的南下服務團或投考解放軍軍政大學。¹⁵¹

僧人樂觀和聖嚴也在這個大動盪時期，從上海離開了大陸。5月3日拂曉，僧人樂觀隨手拿了一套換洗的衣服，放在一個手提布包中，離開靈隱寺，步行至杭州火車站，坐上前往上海的火車。偌大車廂中，只有零星幾個人。下午4點，拖拉一整天的火車終於到達上海。他從站長口中得知，當天早晨杭州被人民解放軍佔領。由於在國民黨官方報紙《中央日報》發表過多篇「反共」文章，樂觀不敢久留，中轉上海後，又開始下一步的南遷之旅。¹⁵² 釋樂觀後來在緬甸安定下來，只是此前還經歷了數年的奔波。跟隨師父釋倓虛南渡香港的青島湛山寺80多個學僧，迫於在港的生存困境，轉投基督教的懷抱。¹⁵³ 釋聖嚴隨著撤退的國民黨軍隊入駐臺灣，還要再過十年，才能擺脫軍隊情報員的工作。¹⁵⁴ 留在大陸的僧人們在漸漸穩定的局勢下，迎接不可預測的新生活。

陸、結論

幾千年來，田租、齋主布施、香火和經懺佛事的收入是蘇南地區絕大多數寺院的經濟基礎。在戰爭的背景下，經懺佛事對蘇南佛教團體的意義更加重要。

這種重要性表現在精神和經濟兩個層面。一方面，佛教深深滲透到蘇南社會文化。「功德顯著」，既能延年益壽，又能超度亡者的各項經懺佛事和佛教法會，與宗教氛圍濃厚，「崇鬼好祀」的江南文化高度融合，為民間廣為接受。¹⁵⁵ 清人袁景瀾筆下的吳郡，幾乎每個月都有和佛教相關的習俗和節日。¹⁵⁶ 迎請僧眾，啟建法會，延生薦亡並不是吳郡的特色，乃「吳越間風俗」。大家小戶，

¹⁵¹ 〈僧道新生參加生產〉，《大公報》，上海，1949年12月4日，版4。

¹⁵² 釋樂觀，《六十年行腳記》（臺北：海潮音社，1977年），頁75-81。

¹⁵³ 郁麗天，〈和尚的蛻變〉，《大公報》，香港，1948年8月30日，版8。

¹⁵⁴ 釋聖嚴，《歸程》，頁214-215。

¹⁵⁵ 嚴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0-23。

¹⁵⁶ 袁景瀾撰，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

對此「習以為常，無足怪也」。¹⁵⁷ 僧人南亭回憶當時家鄉的經懺：「說起經懺來，鄉村人家沒有一戶不信仰。你只要有一、兩間茅棚，你都得要供紙質彩色的佛像和神像、竈君、祖先。死了人，哪怕是一個和尚，都得要念三卷金剛經，不然得話，鄰居親友就要嘆息著說：『連磚頭瓦片的聲響都沒聽到。咳！可憐，可憐！』」。¹⁵⁸ 戰爭帶來的家破人亡以及生者對朝不保夕的恐慌促使人們去經懺佛事中尋求救贖。美國學者楊美惠（Mayfair Yang）提出過「禮儀經濟」的概念。她將「禮儀經濟」定義為：「人們與神祇、祖先、自然界的神靈以及鬼和魔鬼之間的交易和經濟交換；它經常把物質和現世的經濟轉移到來世的神界中去，以一種祭拜諸神的形式來為『身後事』投資。」¹⁵⁹ 佛事經濟作為一種儀式經濟，它「不是直接導向利潤的積累，正相反，它反而為非功利性的目的用掉很多利潤和儲蓄。」¹⁶⁰ 筆者認為，楊美惠對禮儀經濟的理解是戰爭之下民眾生活雖然艱難，但寺院佛事沒有斷絕的原因之一。

除了民眾的精神需求，經懺佛事對寺院和僧團的經濟意義在戰爭時期更加顯著。無論是1937年全面爆發的抗日戰爭，還是抗戰結束後國共兩黨的內戰，都對蘇南大多數寺院的田租收入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抗日戰爭時期，除了蘇州靈巖山因淪陷後購買土地，可在相對平穩的條件下獲得田租，天寧寺、金山等土地星散於各地郊區、農村的寺院已經很難獲得足夠的田租收入維持日常生活。這種情況在國共內戰期間並沒有改變。共產黨游擊隊在蘇南活動頻繁，相比抗戰時期，地方動亂交通阻隔的情況沒有明顯好轉，收租仍然是一個大問題。¹⁶¹ 田租大幅減少後，叢林道場更加依賴佛事收入，蘇南佛事市場的競爭也更為激烈。

國共內戰時期蘇南經懺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僧團數量的增加。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蘇南地區首當其衝，許多僧尼跑到相對平穩的蘇北

¹⁵⁷ 《宜禁女尼禮懺說》，《申報》，上海，1875年3月13日，版3。

¹⁵⁸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出版社，1972年），頁17。

¹⁵⁹ 楊美惠、何宏光，〈「溫州模式」中的禮儀經濟〉，《學海》，第3期（2009年），頁21-31。

¹⁶⁰ Mayfair Yang, *Re-enchanting Modernity in China: Ritual Economy & Religious Civil Society in Wenz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281-282.

¹⁶¹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頁325-332。

寺廟。1940年後，因共產黨游擊隊及日軍清鄉運動，蘇北不再寧靜，已經有不少僧人逃難蘇南。國共內戰開始後，更多受戰火波及的東北、華北和蘇北僧尼南渡避難，他們的到來一方面推動了蘇南佛事的興盛，另一方面也加劇了蘇南經懺市場的競爭。許多中小寺廟為了獲得更多的佛事訂購，不斷降低標準，滿足齋主各項娛樂性的要求。蘇南的經懺形式更加豐富多元，也更為佛教修行者所不齒。

對於這些以經懺為生的僧尼們，如何平衡趕經懺和宗教修行，似乎並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蘇南許多經懺從業者並非因信仰進入佛門，特別是那些佛店的遊方僧，佛事只是他們謀生的工具。經濟繁盛、佛事高度商業化的上海，絕大多數寺廟以經懺收入為支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職業僧尼高度重視物質利益，對經懺收入的分配也格外敏感。不少寺院因佛事收入或私人利益分配不均發生糾紛。寺裏的普通清眾為了滿足個人利益，為敵視的管理層僧人扣上「共匪」的帽子，或者為了爭奪更多的經懺市場，紛紛加入國民黨，尋求政治上的優勢。相比太虛等高層僧眾為了佛教團體利益的政治參與，本文研究的普通經懺僧更多出於私人需求。換句話說，相比高層僧人的宏圖大志，經懺僧更關注具體的個人利益。

蘇州靈巖山寺則是相對理想的存在。僧人真達接手靈巖山後，定下「不應付經懺」的清規，自此該寺不為任何人單獨誦經拜懺。靈巖山的佛事，主要是以念佛為主的佛七，在七日之中，除了必要的飲食和睡眠外，僧眾專心參究、一心持念佛名。僧人們只在正常的宗教修行之餘，將功德回向給出錢訂購牌位的齋主。這種佛事方式以宗教修行為主，經濟目的為輔。相比那些專門為人誦經拜懺，為了愉悅齋主不惜加入各種流行小調的寺院，靈巖山反而獲得更多的經濟回報。1949年後，靈巖山的經濟模式優勢更顯著。土地改革之後，田租收入驟減，經懺佛事需求減少，許多寺院陷入經濟困境。靈巖山僧團卻憑藉虔誠的宗教修行，成為江南香客心中的佛事淨土。寺裏仰仗佛事收入能夠正常運行，直到「文化大革命」。¹⁶² 2022年5月，筆者前往該寺做田野調查，與來寺做佛事的女香客們同吃同住數天。這些香客中不乏上海、江西等外地人。筆者詢問她們為何不在當地做佛事，在疫情局勢不可預測的當下，非要跑到靈巖山來？許多人這樣回答：「靈巖山僧人多，念佛功德大。而且他們不單獨為人做佛事，收費便宜。」

¹⁶² 〈靈巖山寺收入總簿〉（1949-1970），靈巖山寺檔案館藏。

我在上海一天的佛事費用，可以在這裏做一個月或者更久。」在靈巖山小住的7天，筆者多次參加該寺的佛事。僧人們先念誦《十小咒》、《楞嚴咒》等早課必誦的經書，最後由寺裏的某一位執事僧念誦需要被超度和祝福的齋主名字、家庭住址等信息，以此回向功德。最後這個環節視單天訂購佛事的數量而定，短則十幾分鐘，長則一個小時。僧人們稱其為「隨課普佛」。

此外，靈巖山實行統一的佛事分配方式。1926年後，釋印光在靈巖山定下規制，無論齋主請多少人參加佛事，均是念佛堂僧眾全體出席，故不開牌，「無開彼不開我之嫌」。¹⁶³ 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有效避免了負責安排佛事的職事僧私人的偏好，也減小了「經懺提成」造成的職事僧和普通清眾較大的收入差距。靈巖山的分配保證了寺僧不會因為薪酬發生過多糾紛，不低的單銀又確保所有人都能過一種相對體面的修行生活，有效地平衡了宗教修行和物質收入。

聖凱從佛教義理的角度推崇過靈巖山模式，本文則從靈巖山實際經濟效益與宗教修行的平衡方面提出新的論證。也許靈巖山模式可以成為兼顧修行和物質的有效出路。

¹⁶³ 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全集》，第2冊，頁906-907。

徵引書目

一、檔案

《蘇州西園寺》（蘇州，蘇州西園寺檔案館藏）

〈安上法師文稿〉。

《吳縣警察局》（蘇州，蘇州市檔案館）

「奸偽假借佛教組織名義掩護情報工作仰切實注意」。

「責令個寺廟教徒一律加入佛教會以明身份而利防範由」。

《武進縣民政科》、《常州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常州市委統戰部》、《中共常州市委黨史編委會》（1-21）（常州，常州市檔案館藏）

「僧志開率眾為人打醮違反佛教慣例，據情轉請制止免滋糾紛」。

「奸偽假借佛教組織名義掩護情報工作仰切實注意」。

「關於常州市佛教工作上幾個問題的反映和我們的意見」。

「反革命分子欽峰交代書：記農民與天寧寺鬥爭的始末」。

「常州天寧寺歷史資料的編寫提綱（第三次稿）」。

「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天寧寺佃農抗租鬥爭」。

《南京市政府社會局》、《中國佛教會》（南京，南京市檔案館藏）。

「為據承報擬佛教經懺聯合會會章的批文」。

「為奉派出席南京市佛教經懺聯合會成立大會情況的會議報告」。

「中國佛教會籌備會成立在首都毗盧寺舉行成立大會」。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華中各省共產黨活動案（二）〉。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勾結閩逆叛變（二）〉。

《靈巖山萬年簿》（蘇州，靈巖山寺檔案館藏）

二、史料彙編

上海商業（1949-1989）編輯部編，《上海商業（1949-1989）》。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

三重淨宗學會、華藏淨宗學會編，《印光法師嘉言陸續編》。自印本，2002年。

- 太虛大師全書編委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31卷 雜藏·文叢（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 日本商業通信社編，《中國工商名鑑》。東京：日本商業通信社，1941年。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編，《上海酒菜業職工運動史料》。自印本，1988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句容文史資料》，第9輯。句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句容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年。
- 中國共產黨常州市委員會黨史編輯委員會編，《常州地區革命鬥爭史料（1926-1949）》，第1集。自印本，1961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近代江蘇宗教。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0年。
- 丹徒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丹徒文史資料》，第7輯。丹徒：政協丹徒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2年。
- 周叔迦，《周叔迦大德文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
- 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南京》。南京：南京日本商工會議所，1941年。
- 劉明達、唐玉良主編，《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1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
- 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南京及蘇州に於ける仏教の実情調査〉，收入大東仁、槻木瑞生主編，《日本の軍・學校・宗教關係資料》，第4期。東京：龍溪書舍，2012年。
- 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全集》，第2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

三、地方志

- 李長傳編，《分省地誌——江蘇》。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袁景瀾撰，甘蘭經、吳琴點較，《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常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常州市宗教志》。自印本，1991年。
- 《常州市土地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州土地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蘇州市志》第3冊第52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四、回憶錄、訪談錄

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天寧寺鄰居九婆婆口述〉，（1986年3月15日），天寧寺檔案館藏。

馮辰年、周文逸、楊樹慧採訪記錄，〈意如法師講述：天寧寺概要（1924-1949）〉，（1986年3月17日），天寧寺檔案館藏。

釋真華，《參學瑣談》。臺北：東方文化藝術研究所，1997年。

釋聖嚴，《歸程》。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

釋樂觀，《六十年行腳記》。臺北：海潮音社，1977年。

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出版社，1972年。

五、雜誌、報紙

《大公報》，上海，1937-1949年。

《大公報》，香港，1948年。

《上海特寫》，上海，1946年。

《太平洋週報》，上海，1943年。

《中流月刊》，鎮江，1944-1946年。

《中國商報》，上海，1940年。

《文匯報》，上海，1946-1950年。

《申報》，上海，1875-1948年。

《江蘇鄉訊》，蘇州，1938年。

《弘化月刊》，上海，1949年。

《南京晚報》，南京，1946年。

《清鄉新報》，蘇州，1946年。

《南京新報》，南京，1941年。

《誠報》，漢口，1947年。

《新生周刊》，上海，1935年。

《新聞報》，上海，1946年。

《銀錢界》，上海，1938年。

《蘇州新報》，蘇州，1940-1941年。

《蘇報》，蘇州，1946年。

《覺群週報》，上海，1946-1947年。

六、專書

- 卜正民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 江燦騰，《太虛大師前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
- 汪仲賢，《上海話俗語系列——上海俗語圖說續集》。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年。
- 邵佳德，《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17年。
- 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
- 侯坤宏，《浩劫與重生：1949年以來的大陸佛教》。臺北：妙心出版社，2012年。
- 英文大美晚報，《中日戰事史蹟》。上海：英文大美晚報，1938年。
- 孫宅巍、王衛星、崔巍主編，《江蘇通史：中華民國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
- 高旻來果，《來果禪師廣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陳永革，《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民國浙江佛教研究1912-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 楊培新，《中國通貨膨脹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 聖凱，《中國佛教儀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 熊月之，《上海租界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
- 熊月之主編，張培德等著，《上海通史》第7卷民國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鄧子美、陳衛華，《太虛大師新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17年。
- 學愚，《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霍姆斯·唯慈著，包可華、阿含譯，《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下）。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
- 韓起瀾著，盧明華譯，《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魏裴德著，芮傳明譯，《上海歹土——戰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嚴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

Nedostup, Rebecca.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Yang, Mayfair. *Re-enchanting Modernity in China: Ritual Economy & Religious Civil Society in Wenz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七、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李濤，〈僧侶從軍？——抗戰後期漢藏教理院兵役案的爭議（1943-1944）〉，《國史館館刊》，第74期（2022年12月）。

邵佳德，〈近代中國佛教制度革新的一個嘗試：以民國時期佛化婚禮為例〉，《佛學研究》，第2期（2018年12月）。

邵佳德，〈近代中國佛教的地緣性特徵：以蘇北僧人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9年11月）。

侯坤宏，〈避風港：1949年前後的香港佛教〉，《人間佛教研究》，第7期（2016年12月）。

黃昆威，〈太虛大師與杭州淨慈寺〉，收入杭州文史研究會編，《杭州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黃慧茹，〈戰後中國佛教的復員與整理（1945-1947）〉，《中正歷史學刊》，第10期（2007年12月）。

程恭讓、程程，〈太虛對「經懺法事」的批評的再討論〉，收入李四龍主編，《樓宇烈先生八秩頌壽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楊美惠、向宏光，〈「溫州模式」中的禮儀經濟〉，《學海》，第3期（2009年）。

釋聖嚴，〈論經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收入法鼓全集編輯小組編，《法鼓全集》，第五輯第5冊律制生活。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20年。

八、學位論文

Eykholt, Mark Steven.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8.

九、網絡資源

〈太平清醮〉，收入「香港民風大典」：<https://hongkong.fandom.com/zh-hk/wiki/%E5%A4%AA%E5%B9%B3%E6%B8%85%E9%86%AE>（2022/10/20點閱）。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通誌》第十四卷「民族、宗教」，收入「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shtong.gov.cn（2023/1/15點閱）。